镀金帝国掠影

芦笛

俞天任君（网名“冰冷雨天”）的《芦笛印象》一出来，我这归国考察报告就不能不写了。不瞒列位，老芦前段确实“潜入大陆”（老邢的用语，NND，跟美蒋特务60年代窜犯大陆也差不多了），但第一没有什么政治使命，并不是去找我的国安上司接头，受薪或甚至受勋，第二并未打算go public。那动因很简单；想去见见阔别多年的亲人们，他们都已经在花甲乃至古稀之外，都是乘坐公车或逛公园不必买票的老者，这辈子见不上几次了。趁我还活着，也趁2012年尚未到来，老稀家的Nibiru尚未光临地球，赶快去使劲见上几次，能见一次是一次，以免贻悔于未来。原想“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的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故作深沉的屁话——云彩能带走么？哪怕是共党也没这本事吧？）”，但蒙朋友热心介绍，在国内结识了一些古道热肠的朋友，老冰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来原计划的秘密访问就在网上曝光了。

我这人天生是个做屁民的份儿，天性与张扬格格不入，属于扶不起的刘阿斗，上不得台盘的主，这辈子只会低调做人，绝无可能如郎咸平郎小白那样去厚颜忽悠众生。更何况我上网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得罪了一切可以得罪的人，真真成了“国人皆曰可杀”，光是威胁要杀我全家的匿名信就收到不下十来封，要是让人家人肉搜索出真身来，那岂不是科着头往刺丛里面钻？姑不说如今定居“长三角”的胡安宁曾赌咒发誓，扬言我一旦回国就要发动暴民治死我，光是我在海外惹下的乱子就够我喝一壶的。须知我真正得罪的人都在海外，那伙烂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要如肖传国那样雇佣个打手乃至杀手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没有方舟子万分之一的名气，挨了也白挨，谁让你嘴痒谁都骂涅？这也不在话下。

回去之前我倒是没太大顾虑，盖我怕暴民而不怕政府——政府若是拿我当回事，不给签证不就完了，有什么必要诱捕我，引起国际纠纷，自找麻烦？冯正虎案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政府虚怯到了极点。时至今日，我党的态度不是offensive，而是defensive的，巴不得把所有的麻烦都堵在门外，岂还会“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发放签证把祸祟主动引入门去？就算是政府捏造个罪名（例如嫖娼，间谍等等）把我牢起来，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正在哪儿都是躺着，在牢里与在家里躺着有何区别？人斯大林还特地发明了“狱内科研”，特地把科学家抓到监牢里去开发高科技，我就不能去监牢里研究中共党史，顺便考察国内狱政？

所以，我入关时毫无顾虑，与“芦笛”出世前归国时毫无两样。那边检官员也丝毫不曾找我的麻烦，例行公事地验了护照的真伪后便“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让我进去了，前后用不了一分钟。倒是出来时有点小小的麻烦。先是那搜索我的女官特别粗暴，不但搜索得非常仔细，历时很久，而且那态度跟吆喝牛马也差不多。检查完后，我提上通过爱克斯光检查过的手提包，没走上五十米，一位关警追了上来：

“对不起，先生，”他的态度倒比那位那位女保安温柔得多，“您还得通过海关检查。”

出境也得通过海关检查，这倒透着新鲜，大概是为了杜绝文物走私吧。我于是跟着他走到另一部爱克斯光探查仪前，把提包放上了大托盘，蒙受第二次射线消毒。

这也算不了什么。国内连坐火车都要安检。那天我提着一大瓶朋友送的软饮料进站登车，一位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我：

“先生，请你打开这瓶子，自己喝一口。”

我遵嘱扭开瓶盖，只觉豪气涌上心来，视死如归，心一横，眼一闭，脖一仰，咕嘟嘟直往下灌。那位工作人员连声叫道：“够了！够了！不用再喝了！”我意犹未尽，干脆把瓶子递过去：

“味道不错，您要不也来一口？”

他貌似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这是为了公众安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当然知道，其实也并无反感，只不过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里的滑稽事，爱用来插科打诨而已。全怪极端回回（芦回回也知道谴责回回，奇怪）把本来好好的太平世界弄成这鸟样，害得全世界人民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少贫富尊卑贤愚不肖，全 TND 提着裤子狼狈万状地过安全门，全无一点绅士淑女做人的起码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回国后，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地巡视祖国的大好河山，从未发现自己的行动受限，亦未发现被人跟踪或监视。当然，我大大咧咧的，天性又很迟钝，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而忽略外界，天生不是当间谍的料（白让高寒、YQY 等人抬举了一场，实在对不住哦），或许有这种事我未能发现也难说。但不管怎样，我从未受到当局的正式盘问或其他形式的刁难骚扰。

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我党至今不知道芦笛是谁，要么我党不把芦笛看成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威胁。这第一种可能并不能完全排除，须知刘晓波也不对我党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我党就是能蠢到把他视为生死大敌。这世上还没有什么蠢事是我党没干过的。所以，党至今不知芦笛是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毕竟还是存在的。我以后还要回国，敬请见过面的朋友不要公开介绍有关本人的信息，谢谢！

一、 经济奇迹

回去最强烈的感受，便是那实实在在的经济奇迹，以硬件建设而言，当前的中国大约早就超过了“老欧洲”，比美国也不遑多让。

先说城市建筑与基础设施。城市就别说了，一律曼哈顿化，处处高楼大厦，正如我在旧作里哀悼过的，“文化中国”早已消失，如今残留的只有“地理中国”。每个城市都一模一样，无论是房屋建筑与布局，是街道的格局范式，绝对一模一样。如今您若睡在延安的酒店里，朝窗外看去，看到的景色也与北京毫无区别。最难得的是，就连阴沟里发出的恶臭，都与师爷先生上次返乡时伴随他温馨遨游全城的异味毫无区别。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城市制作成了工业上的所谓标准件，可以彼此互换而绝不会发生操作障碍。只是我才疏学浅，至今尚未想出“城市标准件”该怎么才能替换使用。

简言之，如今中国已无旅游价值，至少城市是这样。我走过的地方中，只有慕名而去的旅游热点丽江古城还能算是中国的地方（据说湘西的凤凰古城也不错，但我实在没功夫去了，下次再说吧），其他地方与中国似无太大相干，无一不是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其实据导游说，就连丽江古城也是假古董。当地曾在 1996 年发生过大地震，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全城的建筑都是新建的。而且，今日的丽江古城已无单纯民居，城内建筑不是旅馆，便是商店餐馆，全由全国各地去的人冒充纳西族、摩梭族负责经营。原住民统统搬到了城外西式别墅区去纳福，个个是以出租物业为生的富翁，每年光租金便起码上百万。

但不管怎么说，或许是指导重建工程的人有点文化，该城还保留了传统的外观，实现了“中西合璧”的理想境界。例如酒店是典型的传统民居外观，但内部一律西化，标间与星级酒店毫无区别，席梦思、电视机、电脑、卫生间等一应俱全，而且保证免费无线上网，论居住的舒适，可绝不是原始人老祖宗能梦见的。我看这才是既能保留传统文化风情，又能确保现代物质享受的正道，只恨这样的地方太少太少。

勿过，只有我辈海外赤佬才会有这种惆怅，绝大多数乡亲（包括我家的亲人）都为遍地高楼而心花怒放，充满了自豪感。这也毫不足怪：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其实是以纽约曼哈顿为蓝本的，如今中国终于按那模式在自家土地上建起了天堂，有生以来又第一次住得那么宽敞，当然要扬眉吐气，无法理解海外赤佬莫名其妙的怀旧感伤。

好在我也适应了这巨变。过去我对回乡一直心存犹豫，迟迟不能下决心，生怕所见彻底替换了我珍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硬着头皮走一回之后，发现原来的担心不过是杞忧——在据说是我故乡的城市中漫步，目之所及，见不到一栋熟悉的建筑，遇不到任何可以唤醒我记忆的景象，这个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毫无相干的彻底陌生的城市，绝无可能替换我那些无限温馨的记忆。我只需假想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拜望搬迁到此地的亲朋即可。

国人为何要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狰狞的水泥森林？原因大约颇复杂，除了暴发小农的粗俗的物质崇拜心理导致的高楼崇拜狂外，更是高昂的地价使得开发商只可能尽量向空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非常不合理，乃是严格按照权势梯度展开的。

如所周知，毛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严格按权势分配一切资源，所谓"城乡差别"不必说，就连城市都按官本位划分了级别，有所谓直辖市，省辖市，地辖市，县城，村镇等极为严苛的区分，并严格按那权力梯度分配资源，如同严格按照干部级别分配待遇一般。后毛共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使得大城市分到的资源远远超出了小城市，当仁不让地成了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为住民提供了最多的工作机会乃至发财机会，却又无法像毛时代那样强制冻结人口流动，于是便使得城市构成了强大的物质引力场，将周遭的农民统统吸引入那个局部"黑洞"中，造成了城市居民爆炸式的增长。如今大城市的住民，我敢说绝大部份并非土著，至少我家乡是如此。外来人口潮水般涌入城市，当然居住要成为大问题，不盖高楼何待？

如果政府不主控资源分配，而是像欧美那样，由市场的天然需求决定物流，则我想中国的城市化也能像西方那样遍地开花，不至于将全国闲人抽吸到北京上海，将全省闲人抽吸到省会。在华北平原上走一遭，您立刻就能察觉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区别，欧洲平原上是连绵不断的小城镇，而广袤的华北平原上除了几个较大的城市，依旧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竟然给人一种"地广人稀"的奇特感觉，与城市里人头挤挤、汽车塞得水泄不通的景观形成强烈对照，构成了新时代的"城乡差别"。

除了遍地摩天楼之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令人印象至深。从北京到天津，如今只需 25 分钟，所谓"动车"（城际列车）时速 300 多公里（据说最高为 390 公里，但我未曾留意到），却全不给人"风驰电掣"的感觉，非常平稳，席不暇暖，不知不觉间便到了目的地。反倒是上海的磁悬浮一点鸟意思都没有，最高时速为 400 公里，但乘坐的感受如同迪斯尼的过山车，颇有点惊心动魄的样子。

不光是高铁，动车与磁悬浮，地铁也充分体现了所谓"后发优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地铁都实行了电脑管理，自动售票机一律使用触摸式屏幕。你只需点击目的地站名，电脑便能立即算出你应付多少车钱，不管你中转多少线。当然这是上海的地铁，北京的则无论远近，票价一律二元，约等于免费乘车，全靠国家亏本营运。其他城市的地铁虽然没有那么便宜，但毕竟该是全球最便宜的地铁了。若干地铁站（不是所有的）的站台已经实行了全封闭，由玻璃钢建成的墙壁将乘客与铁道隔开，车到时门才开启，与车门一一对应。记得 70 年代末（或 80 年代初）北京某暴徒曾在列车进站之际将无辜乘客推下月台。如果全国的地铁站都改为这种格局，那此类恶性案件便可杜绝了。

服务设施也很齐备。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旁有醒目的时间显示，告诉大众红灯或绿灯还要开上多少分钟，让等待的行人或司机心中有数。地铁车厢内除了广播外，尚有液晶电视

以及电子告示板不断显示下站名称，一律中英文双解。公共汽车内也同样如此，只是广告与废话实在太多。当局似乎把百姓当成了幼稚园的小宝宝，在一切场合孜孜不倦地告诉他们该如何乘车，如何下车，如何注意安全，各种禁止事项，等等。这种过度关心，不但是对公民智力的侮辱，而且以大批无聊屁话淹没了乘客真正需要知道的有用信息。

当然这也是我这海外赤佬的感觉，绝大多数乘客对那些噪音污染早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次我在北京南站排队购票，听大喇叭（那绝对是中国人的特殊爱好）中一个女人不断地嚷嚷，那声音和回声混合在一起，绝对听不懂任何一个字，而且极度刺激袭扰神经。我忍耐了几十分钟，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又无可能让她住嘴，乃转身问排在后面的一位同志：

"你能听懂她在广播里嚷嚷什么么？"

那位先生怪怪地看着我，似乎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向他提这种怪问题，颇纳闷世上怎么会有人傻到竟然会去注意广播里发出的噪音，良久略显失望地摇了摇头。

"你也听不懂？"我进一步落实道。

他再度怪怪地看着我，再度摇了摇头。

"那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大声穷嚷嚷折磨人呢？你不觉得这噪音干扰非常难受？"

他第三次怪怪地看着我，第三次摇了摇头，这次有点绝望的意思，大概以为我精神不大正常。我长叹一声，把身子转了过去。

类似的对话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过一次。一位坐在东方航空公司柜台里的先生对着麦克风嘟囔了一阵子，似在背诵莎翁的十四行诗，要么是密宗的咒语。那诵声照例和回音混在一起在大厅里来回翻滚，构成一种奇特的音响效果。我于是问负责指引办理登机手续的乘客的那位服务员小姐：

"对不起，小姐，我有语言障碍，你能为我翻译一下那位先生广播的重大消息么？"

小姐不大自如地答道："对不起，先生，我刚才没注意，没留神他说什么。"

"原来你也有语言障碍，所以跟应付外语考试一般，必须聚精会神才能听懂？看来我的中文实在太差劲，刚才我全神贯注仍未听懂一个字，至今无法断定那到底是普通话、上海话还是外国话。不过，请告诉我，那到底是不是乘客须知的重大消息？如果是，为何用这种难懂的方式晓谕大众，而又无人理睬？如果不是，那他这么嚷嚷一气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说话耗用的体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何况还有大功率扩音机，但噪

音能造成公众健康问题也是公认的。你能不能代我向贵公司反映一下，以后用文字显示必要的信息。如果不是乘客必知的，则我建议不妨免掉这种服务，好么？”

话说回来，撇开文化上与美学上的考虑，中国的城市建设毕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战后重建，大概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 900 万方公里土地上，每个城市都如同广岛、长崎一般，被核弹彻底平毁了，每幢建筑物都是新建的。光是这一空前浩大的工程需要的建材诸如钢筋、水泥、玻璃钢、钢梁等等的数量就是个天文数字，更别说建起那无数摩天楼、立交桥、高架公路、高架铁路、机场及其配套设施，开挖隧道、地铁，管理空中、地面与地下交通等所需的技术。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与如此庞大的称职的技术队伍（包括设计人员，施工的技工，管理人员等等），竟然在短短 30 年中（尤其是最近 10 年中）便如同雨后的蘑菇一般遍地钻了出来，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与变魔术无异。

岂止是基础建设如此？我上次回国是 2000 年的事，彼时私家车还如凤毛麟角。这次回去，满街跑的都是私家车，平均年龄大约不会超过五岁，还全是好车。世界上大约还没有哪个汽车大国如此年轻，就在最近四五年之中突然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 genie 一般在虚空中成型。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与如此庞大的技术员工队伍，到底是怎么在短期内就训练培养出来的？

IT 工业就更不用说了。电脑与手机的普及率大概当仁不让是天下第一。10 年前我回国，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网络为何物，没几家人有电脑，更不知 email 所云何物。我家算是知识份子人家，兄姐们都是所谓“高知”，然而那阵子只有两个姐姐家有电脑，只有其中一位有邮箱。这次回去，每家都是四五台电脑，都是液晶大屏幕，一律无线上网。晚上家人全在网上娱乐消遣，有看严肃文字者，有购物者，有打麻将者，有与人闲聊者，可谓各得其所。

国内网购也非常发达，如今已无“土特产”一说，所有的地方特产都能在网上买到。但国内的网购很奇特，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那就是不能靠刷卡购物，必须先去某个中立的第三方担保机构开个帐户（称为“支付宝”），划入一定资金，挑中所需货物后，对方送货上门，十天内不必付钱。如质量不满意可以退货。十天后若无异议，则售方通过第三者从那帐户中提款。

这奇特的发明完全是针对骗子横行的具体国情作出来的，但似乎也没有妨碍交易物流，只是对海外赤佬颇为不便，使得他们的外国信用卡或银联卡丧失了购物功能（除非是在国际机场的免税店中），只有取款功能（无论是信用卡还是银联卡，都能在中国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的现金机上提取人民币）。我多次试图靠信用卡购买机票（火车票则根本无法网购，据说是因为票价不打折扣，中间商无利可图，因此只能到车站或城内的售票处去面对面地购买），多次被拒绝。好在中国有的是廉价劳力，靠人力支撑的服务业天

下无双。虽然无法网购到机票，你只需向什么“携程”或其他旅游网打电话订购，人家就会免费送票上门，以现金交易，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比网购似乎也未遑多让。

总而言之，国外是靠电子服务尽可能节省劳力开支，而中国则是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力提供第一流服务。我在小哥哥家住宿时，某日他家的饮水用完了（现在国人饮用的都是净化水），嫂子当即给卖水的公司打了个电话。她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门铃就响了。那送水者在进屋之前，如同外科大夫或科研人员一般，取出一对一次性使用的塑料脚套，套在鞋子上，然后才扛着替换的水瓶进屋，以免把客户的客厅和厨房地板弄脏了。那考虑之周密，令我目瞪口呆。我惊问哥哥，这售水服务何以如此应答如响？哥哥说，那家公司的广告承诺过即时送货上门，他们平常派出许多送水员骑着电动车（我最讨厌那无声无息的东西，有次几乎把我这反应迟缓、步履维艰的颤巍巍的八旬老者撞倒了）或摩托在街上到处巡游。公司接到催货电话后，当即将客户地址告诉就在那家客户附近巡回的送水员，让他将水送去。这种高品质服务，也只有在劳力极度廉价的国家才能提供。

手机之普及就更不必说了。下了飞机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大众穿得非常之好而且时尚，再不是十年前的土老帽了，衬得我这海外赤佬格外寒酸土气，第二印象是人人手提相当高级的手机，不是 iPhone，便是 Blackberry，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其中有许多是山寨版，不禁肃然起敬。当然也不全是山寨版。家庭聚会时，小辈们聚在一起，互相检查对方的手机，比较谁的上网速度最快。那些手机都很不错，而且都是真品，并非来自水泊梁山。

即以山寨技术而言，那也相当了不起。听朋友说，中国人虽无原创力，但如今只要外国出了什么新玩意，相应的山寨产品不旋踵就推了出来，而且还结合中文特点，对原发明作了极大的改进。此话大约不虚。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中文手机也能发短信，而且无法想象怎么才能靠十来个按钮拼写出全部汉字来。这次回去才发现那设计非常巧妙，其实是抄袭英文手机的 smart spelling。但即使是抄袭，也是活学活用，本人绝对想不出那简单、有效、易学的输入方式来。正因为设计巧妙易学，我才在稍微练习后即能与人进行短信对话。尽管对方使用的是书写输入（这大概是中国人的又一发明吧），我靠按钮输入，速度也没慢到哪儿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能不对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与模仿能力深怀敬意。如所周知，中华民族傲然有别于世界各民族的特点，是她那令人无法置信的惊天动地的愚蠢，谋略全世界倒数第一，被人卖了还乐呵呵跑得屁颠屁颠地帮人数钱，偏偏还不知耻，专门吆喝叫卖见不得人之处，要厚颜自吹自家的神机妙算胜过鬼谷子。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无数的例子。但如今目睹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不能不修正自己的看法。看来中国人的愚蠢主要表现在社会领域里，主要还是个“文化诱导性智障”的问题。在工程技术上的学习与模仿能力则毫无疑义是第一流的。由此看来，国人惊天动地的愚蠢并非先天原因使然，不是不能纠正的，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仍有可能，疗愚事业大有可为，不能不令人无限欣慰。

电子工业与汽车工业也跃居世界先进水平。80 年代我出国那阵子，国人最高理想便是买上一台日本彩电，若是谁有一部“雅马哈”摩托车，则立刻在大家心目中成了金甲神人。而如今中国价廉物美的电视机与摩托车等产品已经彻底击败日寇，据说不仅将日货逐出了国内市场，而且业已席卷东南亚市场。东南亚之大，已经放不下日本人的销售室了，令我这仇日者觉得无比痛快。10 年前我写《仇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时，就曾痛诋张贤亮的“抵制日货”的滥情号召，主张国内厂家向当时的长虹集团学习，先以日为师，学会了人家的本事后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来将日货逐出市场。如今这理想终于实现了，其快又何如也！

当然，离开帝国主义无比猖狂的经济侵略，这经济奇迹就绝无可能发生，起码上述各产业那庞大的技术队伍就不可能培养出来。这次回去，才算是真正明白了“世界工厂”是什么意思。它其实与英美此语的涵义完全不同。如所周知，19 世纪前的世界工厂是英国，20 世纪的世界工厂是美国，21 世纪的世界工厂是中国。然而相似者不过是皮相的。英美充当世界工厂，靠的是自己的资金与技术，而中国充当世界工厂，则是全世界把工厂搬到了中国去。如今世界上大约找不到一家没在中国设厂的西方公司。就连家家户户用的油烟机，也赫然打着“西门子”的铭牌。这种借鸡生蛋、速成致富的偷懒取巧高招，似乎要比英美当年靠自力更生致富的笨法子高明得多。

可笑的是，国人尤其是识字分子以其固有的愚蠢，竟然连这简单的因果关系都看不出来，至今似乎无人悟出，他们之所以能过上祖辈从未梦想过的好日子，靠的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对中国发动猖狂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野心狼。中国人对“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成语的诠释理解完全是颠倒的，那就是认恩为仇，认仇为恩，其最辉煌的例证就是国人尤其是识字分子对苏美截然不同的态度，它永远是昭示与纪念中华民族不识好歹，不辨善恶的愚蠢丰碑。我在下文中还要回到这话题上来，这里只是提一下。

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奏效，前提是有一个与列强里应外合的卖国政府，而这就是邓小平立下的历史功勋。我党相对于前任统治者的巨大优势，是根本不受民意制衡，卖国与否全在党魁一念之间，因此一旦打定主意，便可肆无忌惮地放手卖国，使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深度，广度，与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满清与民国的总和，当然要引出空前的经济繁荣。反过来，无论是晚清帝室，是袁大头，是蒋介石，若是敢动念去干类似的事，只怕还没能做到亿万分之一，政权就要被愤怒的爱国愤青们推翻，臭名昭著的“保路运动”就是明证。所以，这“卖国求荣”的历史重担，似乎也只有我党才能挑起来。

不仅如此，在浮光掠影地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之后，我一直在想：若是 1989 年学运触发了中国政局的大规模改变，中国在苏联之前实行制度转型，成立了民主政府，今天

还会有如此的建设成就么？我深表怀疑。上面已经说过了，“荣”是“卖”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罔顾民意，靠制造制度性不平等来牟利的下流极权政府，不靠“低人权优势”贱卖人力资源，全世界还会把工厂搬到中国去么？而若不是这么做，上面说到的那一系列资金与技术又从何而来？由此看来，中国民众虽然愚昧，但在“舍民主而求繁荣”这点上，似乎还是有点常智的。

二、 社会组成巨变

这次回国的又一惊奇发现，是中国城市的社会组成已经发生了巨变，再不是我走时那样了，其最突出的改变，是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横空出世，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人间蒸发”。

我走那阵子，国内还根本没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所谓“个体户”，多半由前“社会渣滓”亦即劳释人员或失业青年（称“待业青年”）组成。这些人得以出现，全靠万能的共产党首次承认无力保障公民就业，不得不网开一面，允许失业人口自谋出路。

惟其如此，全社会对这些“无正当职业者”一致采取了歧视态度。他们的生存空间极度逼仄，只能做点小生意，记得出名者有什么北京的“大碗茶”，安徽的“傻子瓜子”等等。其中佼佼者称“万元户”，也就是年收入达一万元。他们对土匪政府满怀戒心，据说从不存钱而是把现金塞到酒瓶里，藏在炕洞里，随时等待“第二次土改”。我有两位中学同学就是这种“万元户”，都是靠做小生意发家，其中一位在家门口支了个行军床，就以那为摊位，在上面放点衣服百货什么的，另一位搞长途贩运，骑着一部“长江牌”摩托，在大众嫉恨的目光中来去如风。或许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嫉恨与歧视，这拨人据说在 89 学运中很活跃，北京有名的“飞虎队”就是他们组成的。但无论是论人数还是经济实力，这拨“倒爷”根本就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既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或经济势力，就连个阶层似乎都不能算。

这次回去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十年间，民间资产阶级从原来那个徘徊在中国上空的幽灵突兀地降临世间。与马克思恩格斯痴情呼唤的那个毫无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幽灵不同，这具有无限生机的资产阶级幽灵抓住了改革开放的难得机遇，落地生根，疯狂繁殖，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便长成庞然大物，拥有的财富不但令“旧”社会的资本家如荣毅仁辈瞠乎其后，而且比欧美富豪也未遑多让。如今的中国机场与国外机场也差不多，停放着富豪们的私人飞机与直升飞机。

资本家们甚至把触角伸进了原来的绝对禁区。如今活跃在国内航线上的有家私人航空公司，名曰吉祥航空公司。该公司据说由温州王家三兄弟搞长途贩运起家，先是购买大巴搞长途客运，填补国营长途客运的空缺，现在发展成了拥有 17 架空中客车的航空公司，董事长似乎叫王均金，也就 40 来岁光景。17 架空客！您去想想光这投入的资金就该是多少吧。如此规模的航空公司，即使是在西方也很了不起了。但在西方的民航史上，我

还真没听说谁是靠大巴客运起家，在短短 20 多年便折腾出了个颇具规模的民航公司。中国人的创业能力，实在是了不起，若不是过往百年中白痴领袖白痴政客们川流不息地把中国往死里折腾，中国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我也享受过，开头还有点提心吊胆，总觉得不是国营的就有点山寨味，为此特地买了保险，好让我家属在我坠机身死后大大地捞上一票，坐上后才发现起降都很平稳，与国营航空公司乃至国外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也无什么区别。只是毕竟是民营，处处得穿政府的小鞋，登机“落机”（广东人管“下车”叫“落车”）不能走登机桥，只能坐摆渡车从舷梯上下。

然而据朋友说，这王均金兄弟也算不得中国的首富。据说在如今的中国，身家过亿者已达 8 万人（另一朋友则说是三四万人）。民营资本家拥有的财富，已经达到了国际财团的规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最近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支付了 13 亿美元现金与 2 亿美元的单据，该集团的李书福成了沃尔沃的新董事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资本家的强大金融实力。

这些人的财富，构成了国民经济的脊梁，把 FT 中文网张力奋文章的有关段落拷贝在这里：

“1979 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时，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全国 GDP 的总量不到 1%。30 多年后，今年初中国官方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民营企业加上微型的小企业，已经达到了 4100 万户。对中国目前整个 GDP 的贡献超过了 60%，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是超过了 50%，并且为中国创造了将近 80%的就业机会。所以阿里巴巴的马云最近有一句话说：现在的国营经济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补充。对应中国国情：30 年前，中国的官方文件还会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现在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主体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数据彰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限活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毫无生机。须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权力的狭缝里歪歪曲曲地艰难生长起来的，论起点与国企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却能在 30 年间一跃而为国民经济的栋梁。它们才是繁荣的缔造者。如果翻箱倒柜地查一下，只怕不难看出国企乃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与寄生虫，其存在全靠欺行霸市的恶性竞争，是权力人为扶持的结果，而备受打压排挤的民企才是经济繁荣的创造者。马克思竟然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有蛊惑力的最大的糊涂蛋。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款爷们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的现代工商眼光，甚至具有世界视野，其发家也未必是卖身给权力的结果。上引文字中提到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就颇有代表性，此人靠创办网站起家，其发家史颇有点像谷歌与雅虎。该同志是 60 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迟至 1995 年出访美国时才第一次接触到因特网，但他与我辈书呆

网虫不同，立即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回国后即开办了“中国的黄页”网站。99 年辞去公职下海，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迅即成为巨富。上文提到的“支付宝”似乎就是他开办的。这种同志的发家史，在我看来还是相当正当的，主要是眼光与智力的结果，似没有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骯脏”。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消亡。回去后与一位朋友在网上通信中交流，他说：现在城里还有谁当工人？听得我一楞一楞的。我去国那阵子，工人还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职业，也是最光荣的职业（当然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如今这位同志却告诉我，如今城里再没人当工人了，却并非 60 年代末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城里人到底干嘛去了？

改当“白领民工”去了。如今城里确实没谁当工人，但并不是说城里就没工人了。共产党的治国哲学，不是他们标榜的唯物主义，而是唯权主义。我反复说过，毛共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一切按权力严格分配的等级社会，其中城乡居民是梁漱溟老先生说的“九天九地之别”，农民与工人分处不同的权力等级，其权力落差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过来人都知道，跳出“农门”远远难过鲤鱼跳龙门。后毛共有限地突破了“唯权主义”哲学，引入极有限的“按资本分配”作为“按权力分配”的补充，但仍然保留了城乡的权力梯度。于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组成的改变时，原有的社会等级便依次“晋级”——城里的新一代上升为“白领民工”，而农村的新一代则进城当工人。不管怎么变，农村永远是城市的殖民地，而农民永远是二等公民。

对政府来说，这种变化省了他们的无数麻烦：若是城里人当工人，则政府就有责任照看他们的福利（当然也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当年朱镕基［据说他与王安石一样，眼中白多黑少］搞什么改制，把中小国企统统送给贪污犯，把广大工人阶级直接抛向街头，压根儿没想到他作为大国总理的起码责任），若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了，就算如朱镕基一般不理不睬，起码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有碍观瞻。如今当工人的却全是农民。从理论上来说，农民本来有国家分给他们的土地，进城打工算是第二职业挣外快，国家并无责任照看他们。第二职业当然不存在失业问题，若是工厂倒闭，回去种田就是了，关国家什么事？您说这设计该有多聪明？怪不得爱国青年们时时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比自豪，咱们的政府算计子民的智力确实是第一流的。

那“白领民工”又是什么意思？共产党治国，为汉语增添了无数涵义无穷的新词语。在“人民国家”，凡是沾了“民”字的，大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般而言，那“民”字作为前缀，意味着“低人一等”，有点像英文前缀 sub。所以“民营企业家”就是比“国营企业家”低一等的生物，而“民工”就是比“国企工人”低一等的生物，“民办”也就是比“国营”低一等的企事业。顾名思义，所谓“白领民工”就是白领中低人一等的生物。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城乡居民依原来的权力等级依次晋级，原来该当农民的农村新一代进了城市，在私有企事业里当上了体力劳动者，便被称为“民工”，而原来该当工

人的城市新一代进了扩招的大学（根据上述构词法原则，其实应该将此类劣等大学生称为"民大学生"，其质量远不如咱们当年），毕业后进了公司，充当下层白领苦力，便被称为"白领民工"。这批人活得其实并不容易。在北京上海那些所谓"一线城市"，每月拿的也就是两三千元人民币，工作极度辛苦，工时很长，毫无劳保福利，而且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为了节省开支，公司常常顶多雇佣他们两三年便将其炒了，省得有涨工资的问题，反正待业青年多的是，不愁找不到替换的人。当然这炒也可以是双向的。一位白领民工在某个企业里顶多也就干上两三年，若看晋级无望也常常会跳槽。

在我看来，白领民工与民工的区别，无非也就是脑体力劳动的区别，收入并不十分悬殊。例如我几乎在每个城市的餐馆都看见雇佣服务员的广告，那报酬一般是 1 千元左右，包吃包住。而白领民工并无雇主包吃住，所得不过两三千元，刨去吃喝住宿，能否剩下千元来还颇成问题。尽管如此，城市居民仍然对白领行业趋之若鹜，而餐馆服务员的位置则无人问津（否则也不会几乎每个餐馆都打广告招聘了）。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心理增值"使然，一如当年的"领导阶级"的谀称哄得大众打破头争着去当工人，在毫无安全保障的血汗工厂里被机器轧掉手臂，打断脊梁，或是被活活毒死（我当年的穷哥们儿起码有十名早卒）。

这种"依原有权力梯度递进晋级"当然不是匀速的，越是处于权势阶梯的高端，则"晋级"的跃迁幅度也就越大，其中最有示范性的例子，大概是从原来的老知青兼"黑帮后代"晋升为未来的党国领袖与炙手可热的权贵的习近平与薄熙来。与此同时，我的老知青同学们大多沦为猿形鹄立、绳床瓦灶的丐帮。

这里顺便说一下，看老哈的《东张西望》文，薄熙来似乎民望甚高，其实我看他是白折腾。由"权威逐代递减律"派生的子定律是"庸人胜出律"。这定律早为勃列日涅夫那庸人从容胜出，不但成了在任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终身党国领袖，而且至今还是为俄罗斯各族人民深情怀念的伟大领袖的现象所揭示，也为胡锦涛的胜出再次证明。早在小胡转正时，我就通告过大众，他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庸主，中国从此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这预言为今上本人在上次什么大会上庄严证实，他赌咒发誓要当勃列日涅夫那样的"维持会长"，亦即绝不改变现状，既不会搞民主改革，也不会如毛左所愿倒回去。

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最明智的选择。斯大林发明的党国的构建原理与运行法则决定，铁血强人只能是第一第二代统治者。在铁血强人死去后，留下来的"领导核心"只可能是庸人。这是因为才干胆略出众者只会引动先皇的猜忌而被无情除去，而为了防止宫廷政变，先皇也只会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蓄意在部下中制造分裂，使得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样，在先皇死去后，政权便落入一伙矛盾重重的庸人之中。这伙庸人推举出来的一把手，绝对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那种因循苟安、得过且过的超级庸人，貌似对谁都不构成威胁。若谁像赫鲁雪夫那样敢有什么改造国家的抱负，则一定会引起同僚极大的不安，要联合把他做翻。由此形成了一种专门把庸人选出来做党魁的负

筛选机制。小薄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悟出这点来，不懂韬晦，太过于喜欢标新立异，“敢为天下先”，这就决定了他只会引起同僚的反感、不安与猜忌，因而只会以政治局委员为其仕途顶峰。

由此可见，权势金字塔上各等级的“晋升”幅度并不一样，等级越高，经济繁荣带来的政经地位的改善就越大。换言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取决于他与核心官僚体系的距离。如果身处所谓“体制内”，则哪怕是区区警察也要变成贵族。

以后我才知道，如今的警察早成了贵族，轻易不会上第一线，什么都靠雇佣军：不但公众场合维持治安靠保安，居民小区的治安也靠保安(似乎是属于该区的物业管理处的)，集市贸易管理靠城管，交通管理靠协勤，等等，等等。只是那些身处第一线的雇佣军们照样身着威武雄壮的军服（协助管理交通的协勤似乎是例外），海外赤佬一般认不出西贝货来而已。其实要知道对方是否警察，须看他是否佩戴上写“警察”二字的臂章。我在国内跑了好几个地方，只见过一个货真价实的警察，那还是因为他手下的雇佣军与某乘客发生尖锐冲突，几致老拳相向，他作为上司不得不出面处理调解。

顺便说一下，中国现在已成 “万国军服博览会”，世界上再没哪个国家有那么多人，身着五花八门的各国军服，从事形形色色的与军务毫不相干的职业了。例如列车员一律朝鲜式（？）军服，肩章领章一应俱全，您说那与军务有何相干？最逗的还是天津五大道的保安，居然头戴苏格兰贝雷帽，身穿英军军装，逼真地再现了当年英租界风光。

我不明白的是，保安本是普通商业公司的雇员，并非政府的执法力量，若在超市内维持治安还有一说，何来的法律权利在公众场合维持治安？这本来是警察的对口专业，警察为何不干，而要使用雇佣军？这种法外暴力机构，仍然是威权机构，并不因为是商业公司就能改变其性质，雇佣的警力仍然是警力。

我在欧美的大城市和小城镇都呆过，从未见到过如此庞大的正式与雇佣的警力。“城管”之类富于中国特色的玩意就不说了，就说警察吧，除非出了车祸，本人在西方基本上没见过什么交通警察，遑论庞大的“协勤”队伍。维持治安的警察也很少见到，见到他们基本是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时，那是负责保护群众，维持治安，防止发生暴力冲突的，并不是弹压驱赶群众的。除了在超市偶尔见到个把保安人员外，无论是在住宅区还是在商业区，亦或是机场车站等等，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保安队伍。兴许机场的保安确实是私人雇佣的，但我记忆中似乎不曾见到过有什么保安人员（安检那儿不计）。这与中国可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哪个角落没有保安的存在，到处以威武雄壮的军服诉说着（更准确地说是呼喊着）我党对垮台的极度恐惧。论警力（无论是正式还是雇佣的）与人民的数量比例，中国绝对是天下第一，而且那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一定为后者望尘莫及。如此庞大的维稳预算（亦即“和谐”成本），大概自有人类以来未之前闻。

当然，从提供就业的角度来看，这也未必是坏事。我曾跟我姐小区的保安聊过天，他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极度满意，十分海皮。据他说，他们公司包吃包住，提供集体宿舍，六人一间，有卫生间（含浴室），电视，电脑，除此之外尚有月薪 2 千元。这比饭馆服务员的平均收入可是高多了，而且什么事似乎都不需要干，其职能需要似乎就是站在那儿，向公众展示他的 physical 存在，以此对罪犯提供一种威慑力。其实他们对出入小区的陌生人根本就不盘问。起码我住过的好几个小区的看门的保安是如此。这种基本没有付出的寄生性职业，谁干上当然都非常海皮。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颇有点像古罗马帝国或后来的大英帝国，城市居民类似古罗马公民或是大英帝国本国内的白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雇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如印巴人）来做，体现了鲜明的寄生性质，只不过那“非罗马公民”或殖民地的“野蛮人”是本国的农民而已。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今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不但对少数民族如此，对汉族人民也如此，是一个城市全面压榨乡村的畸形国家，只不过其压榨方式比毛时代更巧妙而已。

商业公司成为政权终端已经够邪门的了，最邪门的是黑社会也成了政权终端。据说为了拦阻人民赴京上访，各地政府竟然不惜动用黑社会搞所谓“协防”，暴力拦阻、抓捕甚至毒打试图赴京上访的冤民。据说这是因为中央对地方实行“维稳问责制”逼出来的。据说中央以赴京上访人数为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地方当局既不能光明正大地杜绝此类行为发生，当然便只能依靠黑社会了。

上面这段话，我是听来的，并非亲眼目睹，亦非受害人的第一手证词，因此处处注明“据说”二字，很可能是传谣。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当年厂里的一位女工后来成了个小企业家，她的企业不幸被列为拆迁对象。她抗命不迁，成了钉子户，当地政府也不搞什么强行拆迁，省得再逼出个毅然自焚的唐福珍来，趁她本人并不住在那里，直接动用黑社会趁夜把她那企业洗劫一空，所有设备都给偷走，所有的门窗都砸得粉碎。她报案无门，又已倾家荡产，再死守那破房已毫无意义，只好放弃，乖乖让政府推平了那房子。这我可是听她本人讲的，算得上第一手证词。我的感觉是，如今我党已经什么道理都不讲（也无道理可讲，无论是从马列主义毛思想，还是从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言都毫无道理），什么脸都不要，已经从毛共那种具有邪教包装的黑社会进化到了赤裸裸的传统型黑社会了。

三、民生

我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只能说一下模糊印象，没有统计调查，当然极不可靠。

一般来说，比起 30 年前，哪怕比 10 年前也罢，城市居民生活是极大地改善了。当然各阶层改善的幅度不一样。最富的当然是上文说过的那些资本家，公务员、国企老板等也

富得流油，至于在一般受薪阶级中，我看所谓“高知”的日子过得最好，不但有房有车，而且居住条件似乎胜过了国外同行。上海教授的住宅似乎比美国教授的面积还要大，当然不是美国式的独家楼，而是公寓楼。除住房外，这些同志的收入似乎也比美国教授多，除了工资外，还有着多种来源的收入：带研究生的补贴，出书或写专栏的收入（据说出书挣不了几个钱，写专栏则特别来钱），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了论文还能领到奖赏，等等。

为私人企业打工的高级技术人员收入也不菲。不少知识份子退休后或辞职后去打工，那似乎是计件拿钱，完成一个项目即有重赏。若是直接去当老板开办企事业（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业单位了，学校和医院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单位），则收入就更高了。因此之故，虽然我的老哥老姐们都已退休，个个过得都比我好多了。每家都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原来从单位买的所谓“福利房”，低价购入，约六七十平米，另一套是后来按市价买的商品房，似乎是 140 平米。第一套房子一般是租出去，第二套则自住。他们买房可不靠什么按揭（mortgage），都是一次付清。除此之外，他们还炒股炒基金，以芦家的高智商，似乎都颇有斩获，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和他们比起来，我可真是“我的叔叔于勒”了，不折不扣的海外穷措大。

但同样是知识份子，下层就比较够呛。听北京一位教授说，一般讲师月薪也就四千左右。在北京那种高消费城市（所谓一线城市）生活，房租起码每月两千，剩下两千用来吃穿，虽算不得水深火热，却也一定是捉襟见肘。一般公司的所谓白领民工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要结婚，唯一的希望是靠父母给房子，盖房价高到荒唐可笑的地步，绝非一般工薪阶层可以问津。而如今结婚的前提便是“有车有房”，这条件就公开在电视征婚节目上提出，跟买卖牲口无异，而大众也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类拍卖自己或购买对方的勾当有何恶心之处。

如上所述，城市原有的工人阶级业已消亡，代之以进城农民充当的所谓“民工”阶级。中小国企的老一代工人阶级已被奸相朱镕基（不知他赌咒发誓要装 99 个贪官的棺材为何不把他儿子装进去）直接抛向街头。90 年代末似乎是这些人最水深火热的时候，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史上的最大丑闻。但这些人的遭遇也不一样。在灾难发生时，熬到退休者都被工厂移交给所谓“社保局”，每月有一千元左右的退休金，而且一般都有原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所以也不是活不下去，虽然紧张一些。但若年轻一点的可就惨了。我们那个厂子有对夫妇，刚失业那阵子穷到连电费都出不起，天一黑就只能睡觉，连水费都出不起，只能到遭到严重污染的水塘里去洗菜。

这次我回去，本想去找那些穷哥们，可惜毫无线索，盖原来的工厂早就被推平改成商业区了，工厂当年盖的福利房也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与我记忆有关的一切建筑都已不复存在：我上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我自己的家、可可的家、芦婆的家、和她们谈恋爱时坐过站过的地方，统统灰飞烟灭，所谓故乡完全是一个与我的过去毫无联系的陌生城市，因此自然也就无从找到当年一道扛活的穷哥们，只可能找到现在还与芦婆保持联

系的所谓“髮小”。敝厂是剧毒厂，女工可以提前退休，因此那些人都逃过了奸相朱镕基的屠刀，现在都在吃社保，居住的是贫民小区。那可不是 140 平米的四室两厅，而是约 20 来平米的一室一厅。下雨时到处漏雨，打着伞在改为厨房的阳台上炒菜，跟我家 70 年代前在贫民窟的生活差不多。不过每月千多元还是活得下去的。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并未到必须揭竿而起的地步。我看她们还活得很海皮，时常互相邀约凑份子，去作低消费旅游，比芦婆开心多了。

物价的上涨颇惊人，似乎超过了正式工资的上涨幅度。10 年前我回去，一般受薪阶级的工资似乎也就在千元左右，而现在的民工收入大约也就是这么多。但那阵子衣食住行都很便宜（当然是相对国外而言）。如今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论穿，国内的名牌衣服比国外的还贵。我穿的皮鞋在国内据说是名牌，那价钱高到令我咋舌，不禁起了当国际倒爷之心。当然中低档服装要比国外便宜。吃的似乎还是比国外便宜，但我老婆不同意，坚持认为国内比国外还贵。她似乎比我有发言权，盖她上次在国内生活了半年，自己买菜做饭，而我只是匆匆来去，上哪儿都是寄食。住若是买房，则贵到一般工薪阶层无从问津的地步，若是租房则似乎比国外便宜，例如在上海城郊租个两室一厅，那房租似乎也只是两千多元，这“租售比”（从学徒网友那儿学来的概念）低到可笑的地步，提示房价远远偏离了真实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是买房不如租房，然而房价仍然居高不下。行则要看是什么，若是飞机票，我觉得与美国差不多。当然国内飞机供大于求，常常装不满人，因此常有打折情事，尤其是临近起飞时更是如此。我很少在国外坐火车，因此无法与国内的火车票价比较。不过从深圳到北京，软卧也就是七八百元，大概要比欧美的便宜吧。若论公交（地铁与公共汽车），则票价当之无愧是天下最便宜的。

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工资增长幅度，百姓应该比十年前更贫困才是，但我的感觉完全相反。十年前没谁有手机，更无电脑，而这些玩意如今已经广泛普及。百姓的衣着也远比过去好多了。就连我访问过的贫穷人家，家里也摆满了水果，体现出“物质极大丰富”。这大概是因为大家除了正经工资外还有额外收入，而这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

我看困扰城市居民的，主要是三大问题，首先是房价高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绝对不成比例。北京上海等地的年轻人若没有父母提供住房，则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筑就香巢。

房价居高不下，我看主要是一种恶性循环：大众害怕通货膨胀抢走了自己的储蓄，于是便去买房保值；“国进民退”把民企挤兑得走投无路，迫使民间企业家们放弃无利可图的实业，把资金转到房地产投机中去，进一步抬高了房价。房价越高，则越促使大众趋之若鹜，使得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业因此成了吸纳货币的巨大蓄水池，构成了巨大的泡沫，使得通胀的威胁更加实在，因而使得房产越发成为保值的“黄金”。由此形成了巨大然而不会爆破（或起码不会迅速爆破）的大泡，蔚为世界奇观，储蓄了巨大的风险。

其次是医疗费用，快镰刀割草赶不上箩筐漏，哪怕是高级白领，也万万不可病倒，一病倒就全完了，绝对是听人宰割的肥羊，而这不是政府而是白衣魔鬼们造的孽。

平心而论，政府在发财之后，也不曾完全忽略人民的福利，还是建立了有限的劳保制度，为低收入或无收入者提供微薄的补助。而且，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民在内也能参加医保，这点远远强过毛时代，那时农民只有所谓“合作医疗”，无非是发点红药水、龙胆紫、枇杷露，若要住院则只有全靠自己掏腰包。加入了医保的患者若是病倒，到所谓三甲医院（三级甲等，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医院，数字越大等级越高）看病，国家帮你报销 50%，而若到二甲医院，则国家帮你报销 60%，其余自理（有可能记错，倘若此，则请国内网友指正，谢谢）。即使是高收入的白领，参加医保也不可能全报，例如医生自己看病就不能百分之百地报销，只是自费的比例要比上述的低。如今能百分之百报销者，似乎只有公务员和离休老干部。

如果白衣魔鬼们不是那么丧天良，则这制度还是能解决大问题的。问题是，国家给公民的这点福利，完全被医院抢走了。如今的医院都是自负盈亏，根本不是事业单位而是唯利是图的商业公司，不但构成了商业销售链的终端，而且还利用其职业的特殊性质，构成了权力腐败链的终端。我过去说，国内最黑暗的地方其实不是官场而是医院，引起白衣战士或其家属读者们的强烈反弹（其实在知识份子中，大夫乃是智力最低下的族群，哪怕是天才，进了医学院也肯定要被死记硬背活活弄成傻子。外科大夫则完全是手艺人，牙科就更别说了，偏偏这些弱智份子无论在中外报酬都是最丰厚的，当真无天理）。那话就算不准确，需要改的无非也就是“国内最黑暗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官场，一是医院”。

这次我回去后才知道，原来医院趁人之危抢病人，靠的是双管齐下：仪器检查与卖药。大夫抢病人主要靠卖药，盖所有的大夫都是药贩子，构成了五花八门的药商的销售环节的终端。药商要想把药物兜售给医院，先得给医院药房主任上贡，但这只能保证自己的货进入医院药房，最后能否卖出还得靠大夫。因此，药商与每个大夫都达成了提成协议（当然只是默契，绝无可能形成文字）。每到月底，药商便仔细查对大夫开出的一切处方（都有电脑存底并整理出了明细帐），确定哪个大夫开了他公司的多少药，再据此给大夫发佣金。大夫本人也要查帐，以防药商少给了钱。

于是，整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崇高事业，就完全变成了纯粹的商业交易。这交易与一般商业交易的区别，在于顾客根本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被大夫强制性卖给了大量昂贵的、他根本不需要、甚至有可能对身体有害的药物。这种强行售货得以发生，全在于病人所处的特殊不利的情势剥夺了他拒绝购买的权利——他本人在生病，绝对不敢不吃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与街上药房卖出的同名药物作价格比较。一般来说，医院卖出的药物售价要略低于街上的药房，于是他当然就买下了医院卖给他的药，浑不知其中有许多药根本就不必吃，哪怕是对症的药，也有更便宜的。

这说的还是门诊病人，住院病人就根本连上述选择余地都没有。大夫开出药来后直接就交给护士，护士便给病人打针发药，病人连看一眼处方的可能都没有，遑论去与市售药物比较价格。先父 2000 年病重时，尽管我们走通了路子，给主任大夫上过贡，他也一口答应帮忙控制开药量，然而下头的主管大夫却拼命地开好药，每天光是针水就是三千多元，十天就是三四万，家父原来的单位业已破产，无法报销，全靠子女们自掏腰包。我去找那畜生，说病人已经是癌症后期，业已全身扩散，放疗化疗都已毫无可能，无非是维持而已，还开什么昂贵的进口抗癌药，增加病人痛苦？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是大夫，责任就是救死扶伤，非得开那些药物不可。他那富贵很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连他头上的主任医都无可奈何。

您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丧德的烂事么？然而这还不是 whole story。大夫和药房都靠卖药有了“灰色收入”，院领导该怎么办？那当然只能充分利用全院的共同财产：仪器。各个医院都规定，大夫在治疗一个病人过程中，检查费与药费之比必须是 45%，那意思就是，一个病人每掏出 100 元，必须有 45 元用于检查，55 元用于药物。医院每个月都要考察大夫的创收比例，若是哪位大夫全月让病人掏出了一万元，其中只有 3500 元用于检查，距离规定差了 1000 元，则按十倍罚款，该大夫必须掏出 10000 元来赔给医院。

这是为什么？仪器是医院的财产，并不是大夫个人负责推销的货物。病人当然要为仪器检查出钱，但那钱在理论上是医院的共同收入，当然必须按权力阶梯分肥，大头只会落在院领导与有关科室领导的手里。临床大夫即使能拿到奖金，那也是九牛一毛。因此，对于开检查单，大夫本人并无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院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荷包丰满，便作出了这一聪明的规定，以重罚逼着大夫去为他们创收。这结果就是，哪怕您害了个感冒，也很有可能被大夫弄去做头部的 CT 扫描或核磁共振，因为感冒必然头痛，而这就给了大夫无情宰割您的借口，尤其是当他在电脑上算出他本月有可能被罚款时（若您碰巧见到大夫在电脑上仔细计算，那多半不是在研究病情而是在计算他本月的“药比”是否超标）。

当然，大夫也不完全都是良心泯灭者，向我披露“药比”的烂污勾当的那位朋友就非常愤怒，大骂“逼良为娼”，说他只能“杀富济贫”，看人下菜碟儿，根据病人的经济状况酌情开检验单。如果来了个牛气十足的款爷，他就猛开检化验，若是看上去比较穷的病人，则他就尽量靠视触扣听和简单检化验作诊断。但即使如此，也未必能确保穷人不挨抢，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如果该月的药比有可能超标，为了避免被十倍罚款，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能不充当药物销售终端，从药商那儿拿钱。盖他过去曾一根筋，试图“清者自清”，却引起同事的强烈不满，几乎把他挤兑出了那个三甲医院，整得他乖乖跟着大伙儿一道捞昧心钱，这才天下太平。开头良心上还下不去，但后来慢慢地也就麻木了，最后还捞出点滋味来，买房买车，颇有成就感，云云。

陈大夫认为这不是医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他认为，只要政府把医院收归国有，把医和药分开，不要让医院自负盈亏而是变成真正的福利机构，则这丑不可言的弊端即可消除，

所以，说到底，还是政府的责任。他还说，若是让基督教会去管理医院，则医院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救死扶伤的机构。

陈大夫所说当然有理。虽然我讨厌基督徒在网上传教，几乎成了偏执狂，但并未因此抹杀良心。对教会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大量好事，本人历来高度肯定，多次指出那些"帝国主义文化特务"比中国人自己还爱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盼望中国富强，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珍惜中华文化遗产，比中国人自己更爱护珍惜中国人的性命。没有他们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则中国绝无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内便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总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则带来了文明。中国如今最大的悲剧，就是只认识到了第一点，从而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抵抗，因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却仍然顽固坚持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主要的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使得中国至今还处于野蛮状态。其实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还真有剥削中国人民的意味（尤其是在一个蓄意制造"低人权优势"的中国政府的主动全面配合下），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到底能从中国抢走什么，老芦迟钝，还真想不出来。

但问题是，就算政府会让教会去管医院（纯属做梦），那也绝无什么好结果。中国人的本事在于"洋为中用"，无论什么好东西都能让它获得鲜明的中国特色。

国内的教堂布道我也曾去参加过一两次，在门口便目瞪口呆：那教堂是新修的，十分漂亮，比国外大部份教堂都漂亮，然而两翼的厢房却是非常阔气的商店。为了查明它们与教会的关系，我特地进去询问服务员，人家告诉我，那些商品虽非教堂的财产，房舍却是从教会租来的。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份儿吧。据我所知，西方教会当然也有房产，但一般是租给贫民，有点像中国的所谓"廉租房"，其实还是属于善行。至于租给商店去牟利，好像在《新约》里也说过，据说那阵子的教堂成了商场，以致耶稣愤怒地冲进去把摊子掀翻了。倘若他老人家生在今日中国，只怕是千手千眼也掀不了那么多。何况他还没能掀翻一个货柜呢，恐怕立即就要让保安逮捕了。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信徒泪满襟。

牧师的布道我也曾耐心聆听过，讲授的完全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位年轻女士的布道最动人，居然告诫信徒们，买东西就得买名牌货，若想节省就对不起自己，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衣服鞋袜都是名牌，因为上帝并不反对人们享受，云云，令我眼界大开，觉得物质气味如此之浓的基督教，便信了也无妨。

当然比起来，基督教会可能算好的吧，佛道寺观更糟糕，开办的目的完全是搂钱。高昂的门票就不用说了（教堂好歹还不兴收门票，当然，那里面也没什么看头， 西方名教堂照样卖票），一旦踏进山门，立即就被人缠住，拼命向你兜售香。据说杭州的寺庙最糟糕，和尚会缠着你去抽签，而那些判词都很糟糕，目的是引起你的恐惧心理，于是你

为了消灾免祸，便不得不花钱请和尚替你做法事消解。此外还有若干狗屁东西以高价出售，它们之所以能卖高价，据说是和尚曾经对之念过经（所谓"开光"）。我家有人就曾从泰山背回一块什么"泰山石敢当"来，据说那是"开过光"的。

这大概就是当基督徒的好处，我这可是从太太那儿学来的。去参观寺庙时（对了，这次还看见江泽民前总书记为云南丽江黑龙庙题的匾额，上书"护国佑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大概也就只有他这么干。由此可见我党如今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每逢被人缠住，我便声称："我是基督徒，教义规定不能搞这些活动。我是来参观人文景点的，不是来参加你们的宗教活动的。如果我参加这些活动，死了得下地狱。"到后来我干脆自称穆斯林，反正"芦回回"也当了多年了。

扯远了，我只想说，如果医院让教会去管，即使不变得更黑，只怕也是天下乌鸦。那个国家的溃烂是全面的，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药可医。

至于将医院再度收归国有，让"医"与"药"脱钩的设想，也不可能解民于倒悬。陈大夫可能忘记了当年的公费医疗是怎么回事。我在回忆录已经介绍过了。先慈 87 年病重时，奸相朱镕基尚未当国，国家尚未实行医改，医院还未变成现在这种纯商业公司，大多数人还享有劳保。然而白衣弱智魔鬼们照样有本事发财。他们和附近的旅馆联手，把它们改成"分院"，分院的收入就不上缴，完全成了医院的黑金库。病人入院第一件事，便是问你是自费还是公费。若是公费病人，他们就拼命给你开药，却把那些药物贪污了，拿去卖给自费病人，所得便装了腰包。弱智魔鬼们就连人血都敢吸。那阵子人血是商品，医院的血源主要是农村中大量的卖血者。需要输血的病人若是自费，他们就少收你的钱，但不给发票，所得便被他们贪污了。陈大夫建议改回去，除非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否则无非是又改成过去那样，能杜绝医院的贪腐么？而若是改成全民免费医疗，只怕百姓立即就要发动轰轰烈烈的人民看病战争，光是医疗费用就能让政府财政破产。

前天老太婆才跟我说，她跟她的髮小通过话，那人正准备去住院。我惊问（我和老婆子当年是一个厂的同事，她的髮小也是我的同事）：何病？答曰：没病。没病为何去住院？朋友们都去住了，她一个人无聊，也准备去住。住院成时髦了？不是，是去"吃医保"。现在国内开了一种医院，是专门"吃医保"的，开在郊外，其实就是度假村，疗养院。大伙儿约好一道去住，院方为防上面来查，也装模作样地开药挂盐水，但"医生"一走，"病人"就自己拔掉，在"病房"里打麻将，打腻了就出去玩，野餐什么的，据说很有意思。那这种医院能赚什么钱？具体原理不知道，反正这种医院就是专门开了钻医保的空子，迎合低收入阶层的低消费疗养的市场需要的。

您说这国家烂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全面溃烂，我看根本就不是改变社会制度或是改变政府可以治愈的。我在《文明真空》文中说，过去的中国是"上诈而下愚"，现在则是"上下俱诈"，成了不折不扣的丧德之邦。不光是政府会坑人民，人民同样会坑政府。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彻底丧失了羞耻心，什么道理都不讲，什么面子都不要了。政府可以

蛮不讲理地拆迁，甚至动用黑社会抢劫“钉子户”，以此逼迫人家搬走，而百姓以高于国外的价格买房产，竟然只能买到 70 年的使用权，那所有权仍然是政府的，因此任何时候政府都可以以“征地”为名，将你从以天价买来的房子中赶出去。政府连这种下作无耻的烂事都干得出来，上行下效，还能指望公民诚实无欺？

第三个困扰据说是子女教育。但我家的人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没有什么可教子女，这方面没有什么体会，只是听人闲谈时提到子女入学何等昂贵。这想来也不足奇，有财大家发么，既然医生可以把职业化为权力制高点，趁人之危去抢劫弱者，教师又胡为乎不可？中国生活方式的优美动人之处，就在于所有的人都力图找到别人有求于己之处，把那化为赤裸裸的敲诈手段。

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大体情况估计是随所处地域的战略价值不同而异。随着城市面积爆炸式增长，原来的市郊农民统统成了城里人，这些人似乎都靠卖地发了财。若是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则要看当地有无商业资源，最富的似乎是地下埋着黑金的煤老板。至于一般的农村，我只能在火车上“考察”。在全国各地“考察”了几千公里，看到的农舍似乎都很象样，破旧的并不多，新房不少。尤其是“长三角”与京津一带，从火车上看下去，村舍都是洋房，周遭的农村都已经田园化了，颇有点外国农村的风味。当然这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风貌。如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均一，西南西北的农村绝对比不上沿海一带的。不过即使如此，我看到的景象与 20 多年前相比，也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阵子东西南北都一样穷，没哪个地区是“先富起来”的。

四、 生态环境

这次回去感到最欣慰的是，生态环境有极大改善。

90 年代我频繁回国，每次回去心里都沉甸甸的：中国人正在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破坏自己的家园，把它变成人类根本无法居住的地方。每次回去我都要经过北京，每次飞机降落前，我都以为下面是阴天，因为根本就看不见城市，但飞机落地后我都发现，城市上空笼罩着的不是正常的云雾，而是极度污染造成的烟雾，鬼话称为 smog 者（smoke 与 fog 融合而成）。城里仍能看见太阳，而且地上还洒着阳光，提示那并非阴天而是晴天。但天空却是灰扑扑、脏兮兮、无比骯脏浑浊的一片，实在没法让人认定那是晴天。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造出了一个不阴不晴的第三态。

这已经成了北京的典型景观。每次我回去都这样，唯一的例外是 1999 年“大庆”，那次我总算见到了丽日蓝天。可惜那短暂的晴空乃是用昂贵的金钱租来的。据说为了迎接那次“大庆”，北京所有的工厂都给关闭了一个月。十?一到来前几天，国家还使用了人工降雨，以此冲去空中悬浮着的尘埃。可惜第二年再去，北京市又恢复了那不阴不阳的第三

态。头上顶着一块脏天，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能见度比真正的阴天还低，让人说不出的难受，然而似乎也就只有海外赤佬有这种感觉，大众似乎习以为常。

有次我从欧洲回国，心里非常难受，那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上空就不必说了，哪怕是在前苏联的空域中也罢，下面都是连绵的森林。什么时候绿色不见了，那就是到家了。飞机飞上几个小时，在无边的灰白色的土地上，只能见到一团团云彩投下去的黑影，见不到星点绿色，更见不到一条河流，那情景跟月球表面也差不大离。出境时我从香港走，飞机飞到珠江三角洲上空时，下面完全笼罩在沉沉的工业废气中，当真是怵目惊心。

更严重的是水污染，老百姓都再不敢喝自来水，改用商业公司售出的净化水。估计无非是自来水通过个离子交换柱，至于质量如何则根本没保证。家乡的鱼虾螃蟹再也无法食用，连文盲都知道它们构成了食物链终端，富含各种重金属诸如汞、铅等有毒元素。原来清澈见底的河流散发着恶臭，水面上长满了水葫芦。目睹此情此景，当真是万箭穿心，觉得中国正在自己的眼前沉沦，而且没谁能阻挡这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不料这次回去却令我惊喜交集。北京城上空的烟雾不见了，竟然可以见到蓝天，那天去奥运村游玩，风颇大，然而风里竟然没有沙子，令我非常惊诧而且不习惯——早在我念书那阵，北京就开始沙漠化了，一刮风便是飞沙走石。我与朋友分享这欣慰感，他却告诉我，也就是那几天如此，平常还是不行。看来我正好赶上了最好的时光。即使如此，我觉得仍然是巨大进步，盖若在 90 年代那阵，要有这种好时光，还得靠政府关闭工厂起码个把月，再加上人工降雨。

更令人欣慰的是，绿色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鸟儿也开始回来了。我在我姐家住时，总是半夜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坐在花园里抽烟（人家室内装修太漂亮，不好意思如在我家那样乱来）。她家门口装的照明灯有传感器，有人走过时便自动开启。一天在灯光下，一只黄鼠狼居然从我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令我喜出望外。对在国外居住的同志来说，这实在没什么稀罕的，不光是松鼠，有时就连鹿都常常会与您狭路相逢。然而那可是在中国啊！能见到一只黄鼠狼也该算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了。

更令我惊喜的是，在我姐那儿居住时，早晨居然听到了鸟叫声！这可是久违了。大概自 70 年代起，我就再没在城里听到过鸟叫。如果不是出国，我还从不知道城里可以有这么多的鸟，早晨叫得你睡不着。即使是在 50 年代，我也从未听到过如此喧嚣的鸟鸣。然而这次回去却居然在黎明时听到了鸟叫声，而且鸟儿为数还不少，虽然没有国外那么多，但比起过去来，不说是比十年前那严重污染的时代，就算是比起五十年代来，也可算惊人的奇迹了。

鸟儿和小动物之所以回来，我想还是绿化使然，而这正是我这次回国的又一惊喜发现。从孩提时代起，在我记忆中，父母坟墓所在的山就是寸草不生的童山。但我这次返乡上坟，但见满山林木葱茏，父母的坟墓已经藏在浓荫深处。20 年前在坟前种下的柏树已

经长成参天大树。当年被迫把母亲葬在那荒山上，一直是子女们心中最大的痛，如今这痛楚总算消解了。

这不是敝乡一地发生的变化。为了广角度地观察国家的变化，我这次特地乘坐火车"考察"了母国的大好河山，行程几千公里，处处所见与几十年前迥异。

文革初与文革后，我多次在京广、陇海、沪杭、浙赣、湘黔、宝成诸线上旅行过，犹记我第一次在车上见到华北平原，愕然发现原来那在地图上绘成嫩绿色的一片者，其实是无比凄凉寡苦的的荒原，不但没有什么河流，而且连树木都少见。不仅如此，那植被破坏还与时俱进，每次旅行所见都怵目惊心。文革初在南方见到的山上还有树木，文革后则无一不是光秃秃的山峦。

但这次我乘火车所见则截然不同，南国山峦都为绿荫覆盖，淮北、华北平原上也到处是树，令人心花怒放。我还注意到，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那些树都很细，平均年龄大约三四岁，估计也就是在近 5 年内种下的。这说明在过去几年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的环保意识都有了个跃进。环境改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百姓有了足够的能源，用不着再去砍伐树木了。这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条，盖四川农民当年的燃料完全靠稻草和树叶，那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背着背篓的农民在路上行走，用一个固定在木棍顶端的尖钉叉起落叶，再把那叶子扔到背篓里去。若是农民没燃料，当然要去偷伐林木，政府再提倡绿化也没什么用处。

这当然不是说形势大好，中国的污染仍很严重。城市高楼污染不必说，大量的汽车废气也不必说，哪怕就是在空旷的华北平原上，能见度也非常之低。本来那地方十分干燥，根本就不该有雾，但现在却是迷雾塞空。在一片朦胧中，但见血红的太阳贴在天际，柔和到可以逼视，提示那不是阴天而是晴天。由此可见当地的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但不管怎样，和十年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那个烂污世界相比，应该算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了吧。这进步非常可喜，希望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能再接再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五、民德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走马观花一番便能下结论的，只能说说靠不住的肤浅印象。

我这次回去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普通百姓不再抱怨了。犹记 93 年回去那次，所有的人都在骂，骂政府，骂社会风气，骂拜金主义，骂人欲横流，骂道德沦丧。骂得我不胜其烦：老邓南巡讲话刚发表，政府摆明了要走资，国家好不容易从李鹏的鸟笼经济死胡同里挣扎出来，尔等还有什么不满的？莫非要倒回去过毛时代的穷日子才称心如意？

但这次回去却再听不到这类抱怨了，大伙儿似乎学会了一个真理：愤世嫉俗什么意思都没有，不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狠命地捞，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悠悠万事，捞钱为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政府与百姓在道德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换言之，政府用自己制造出来的烂污社会环境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全民，以致无论再怎么烂污的事体，百姓都已见惯不惊，安之若素，说不定还有三分羡慕。

如今国内的骗子已经与时俱进，实现了高科技作业。我曾在一家银行屋顶上看到大幅的电子告示牌（就是那种会行走的灯光告示），"温馨提示"大众提防骗子，说是若您接到催款单或是催款电话，让您把欠下的水费、电费或电话费交到某个帐户去，那一定是骗局，万万不可相信，云云。这提示不但温馨，而且非常实在。我姐就多次接到这种催款电话，她的老同事也如此，以致她后来跟老朋友打电话，对方根本不接，因为那是一个陌生号码。

最绝的是，我一次在网上跟朋友笔谈，我先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接着那朋友便问我是否带够了钱，他可以赞助我两千元，要我给他个银行帐号和户名，他把钱打进去。我收到那信息后不久，手机就响了，一看是条短信：丘国光，中国工商银行帐号 XXXXXXXX。我于是问他，刚才那短信是不是你发过来的，他莫名其妙，说没有啊，我于是转述了那短信的内容。他立即说，那人是骗子，大概通过黑客手段看到了咱们在网上的笔谈，以为那手机号是他的，又看到他要转钱，马上便发了那短信。若那手机号真是他的，则他就会以为丘国光就是芦笛（他不知道我的真名），想都不想就会往那帐号里打进两千元去。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连称好险好险。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我才回去时，就有人反复叮嘱，用卡取钱千万要小心，在输入密码时，务必要用手牢牢罩住上方，让谁都无法看见你按的是哪几个键，盖下流台湾人发明了一种高科技手段，能在取款机上安装什么设备，不但能测出卡的电磁识别号码，而且能用微型摄像头把你输入的密码摄下来，过后便能复制出一个信用卡或银联卡，将你的钱提空。我开头还照办，但后来觉得这实在无法忍受——用手遮挡得密不透风，连自己都看不见数码，还知道按哪个键？于是也就没这么干了。好在我后来查了一下，似乎也未被盗窃。

在这种大环境下，刚回去的海外赤佬必然是猪头（阿拉伯上海人说的"戆头"），只有被骗的份儿。光是买东西，咱们就老是无法适应"除了火车票之外，无任何商品是明码实价"的国情。从飞机票开始，什么都可以讲价，而且砍下来的价比例并不小。这说明整个第三产业都有很大的诈骗成份，它不是按"成本加利润"的"普世价值观"来制定价格的，而是按"成本+利润+诈骗"来制定价格。所谓"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

这说的还是正当生意，按国内标准来说根本算不得诈骗。在云南丽江旅游时，有个四川骗子缠住我们，说只要 20 元就能用面包车拉我们到三个景点去，而且他们还能帮我们逃门票。所谓"逃门票"，就是绕过收门票的地方进入公园，这样游客就不需要花钱买门

票。为了让游客相信自己不会吃亏，她还声称等我们玩完了，再收那 20 元，于是大家便同意了。到后才发现，那儿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园，没有门票一说，只有卖旅游票的，旅游节目是在茶马古道骑马，以及在拉市海乘船，票价每人 380 元。大伙于是跟那售票的砍价，砍到了 300 元。次日我们才知道，咱们是刘少奇主席说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占大便宜"，正经旅行社组织的同样节目，只收 120 元，骑马走的路还比那长得多。所以，对于真正的诈骗团伙来说，上述"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的定律并不成立。

当然，那四川骗子也没有完全撒谎，"逃门票"之说也不完全是虚构。丽江黑龙潭门前就有些人专门干这种事。那公园门票 80 元（要么是 60 元，记不得了，称为什么古城维修费），但后门无关卡，只是游客不知道而已。于是有的人（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就在大门前兜揽生意，告诉你她能带你逃门票，只需要一半价。如果你怀疑那是骗局，她就让你先去查明门票价是否真是那么多，而且保证带你进去后再收钱。那票价当然如她所说。若你想省钱，自然会回去找她，她就带你从没有关卡的后门进去，然后再向你收钱，十几分钟便能挣 40 元。

当然，不能说这些人是诈骗，人家出卖的是你不知道的信息，跟新闻报刊卖钱似无本质差别。问题是，那公园为何不杜绝这弊端，以致带人"逃门票"居然成了一种职业？我阴暗心理发作，免不得要怀疑那是公园工作人员的故意安排——从后门半价进去而不买票，自然也就不存在财经查帐问题。

即使是正经的旅行社，也未必能与诈骗完全脱了相干。例如上述到茶马古道骑马游览，那价钱虽然公道，可惜所谓"茶马古道"整个是骗局。据知情者说，真的茶马古道根本不在拉市海附近，但旅游局为了方便安排旅游路线，便人为地把茶马古道"搬迁"到了那儿，以便增加吸引力，否则光是个拉市海，除了候鸟光临的季节，根本就没有什么游览价值。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咱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但把所有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且深刻全面地改造了人民的价值观，使得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大众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其实也就是他荷包里面的钱数，只有挣了大钱的一生，才是成功的海皮的一生。

就是为此，才会有亲友为我感到惋惜，觉得我不该搞科研，更不该出国，认为我当初若本科毕业后不去读研，更不要出国，则不说发大财，起码收入要比现在多多了。我告诉他们，人各有志，各人的追求不一样。国外享受的精神自由姑不论，如果我不出国，就不可能追求我的真正爱好，实现我真正的价值。他们仍然不以为然，因为离开金钱谈"实现自己的价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也没什么实际意义。这当然也是实话：

梵高生前穷愁潦倒，而且籍籍无名，出名是死后的事。出名若不与享受联系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意思？

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巧取豪夺、不劳而获才是大智慧，而忠厚诚信则成了“戆头三”、“阿木林”，可鄙可弃的另类。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的一位无产阶级。那天我从酒店出来，急着要去赴一个约会。上海的特点，是地铁站十分稀疏，下车后还要走很远。因此从那酒店到最近的地铁站必须打的，可惜从地铁站打的到酒店没问题，反过来就难了。我等了半天，来了好几部的士，却都不肯搭客。我于是只好出了酒店的大门，去街上打车，可等了半天都没空车。

这时来了一部“摩的”（摩托改的“的士”，外观各不相同，多为三轮，但我那天坐的那部是两轮的，空间非常逼仄，其实就是坐在后座上，只是多了个雨篷），司机大概是个退休老工人。我告诉他我要上哪儿去，他报了两块钱的价。我讶其数额之低，也没多说就坐上了。那老师傅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只是我自退休后便过烂日子，造成很严重的“表面老化”（赵本山小品的台词）。他带着我在车丛中穿来穿去，时时让我吓出汗来。我看他那把子年纪还干这危险性颇大的体力活，心中十分怜悯，心想我还是按的士的价钱，到站后给他十五块钱算了。

到了地铁站，我开始掏钱（但凡这种场合，我动作总是很不利索，且有辨认面额的特殊问题），先掏出两块递过去，那老师傅不接，脸一板，厉声道：两块钱怎么够？起价就是四块！我接着又掏出两块，把四块递给了他。这次他倒是接下了，正准备走，却见我还在掏钱，于是又停下来等我。我接着又掏出了五块，老师傅一把就抢了过去，说，对了，起价四块，车费五块，正好！我本想掏够十五元，至此心灰意懒，懒得再掏，谢了谢他就进站去了，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非但不会感激我，还会认定我这“阿乡”是个戆头三，好糊弄，说多少便是多少，傻傻地任他宰割。

另一次经历没这么糟糕，但也很无趣。那次我去的地方离地铁站不远，本可步行，但适逢下雨，而站口正好排了一溜摩的，都拉起了雨篷。我于是坐上头一部车，报价四块。到了小区门口，他正要右拐，我一看，说错小区的名字了，应该是对面那个小区。我于是立刻通知那师傅，他立刻停了下来，说，要去那个小区，四块不够，必须是五块！我寻思，TMD 这是什么屁话？俩小区大门面对面，无非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只怕左拐进去走的路更少，因为那幢楼离大门口颇近。但我也懒得扯，说五块就五块吧，没问题，他于是左拐开了进去。Again，我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一定在心里笑话我这戆头三。盖我非常熟悉上海人的德行（骂够广东人了，这次改骂上海人）：抠屁眼儿咂指头，小算盘精来兮，别人看在眼里懒得计较，他们还以为你是赣度（憨大）。

当然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这么糟糕。在从上海飞往丽江的飞机上（对了，上海到丽江的机票记得是 2 千元，似乎比从纽约飞到旧金山还贵），我旁边坐着个上海某县某局的女

科员（上海人所谓“阿乡”）。那女的很健谈也很爽直，告诉我他们不是旅游团，前后左右坐的全是同事，科长坐在前面的一等舱里，他们是去丽江“考察”的。这次去云南“考察”已经是第三次了，头两次去了昆明和西双版纳，这次去丽江。全国各地她基本都“考察”过来了，新马泰也去过，只是还没去欧美“考察”过，那必须是科长以上才有资格。

这当然是贪腐，然而比起大夫趁人之危抢劫病人及其家属、摩的司机拉到半路涨价的做法来，您说谁更让人生气？让那两位开摩的的无产阶级去当官，难道还能有好的？只怕连那位女公务员的诚实爽直和文明礼貌都没有。

从公众行为来看，上海大概也是我去过的大城市里最糟的。一般而言，我觉得整个社会确实发生了浅表的文明化，可惜上海大概最落后。

当年回国，还在归化国机场就一肚子气：候机室里全是炎黄子孙，开始登机时，大众轰的一声全站了起来，绝不排队而是拼命往前头挤，TMD 跟挤公车毫无区别，似乎有挤不上去的可能。目睹此情此景，连以礼貌为职业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无法控制自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鄙夷的神色，有时甚至如国内维持秩序者一般大声吆喝，令我恨无地缝可入。飞机着陆后，还在滑行中，大众又是轰的一声全站起来，纷纷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提下来，站在过道上，急不可待地争取第一个跳下飞机去，TMD 跟地狱里忙着去投生的恶鬼也差不多。

公众场合的粗野行为就更是常规景观了，无论是医院，是商店，是银行，只要有柜台的地方，大众绝不排队，都拼命挤在柜台上，毫无隐私可言。到处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就更是家常便饭。街上的红绿灯则完全不起作用，只要绿灯一亮，无数的自行车就潮水般地涌过去，改成红灯后仍然过不完，使得绿灯放行的人和车辆久久无法通过，全都挤在一起。

这是 90 年代初的事。过了一两年后再去便有所改观，柜台前一米外画上了黄线，顾客只能在黄线之外等候。公共卫生也有改观，只是交通仍然非常恐怖，坐出租比坐过山车还惊险。

这次回去，总体感觉好多了。无论是市区，是公园，还是其他公众场合，乱扔果皮纸屑的少多了，随地吐痰好像没见到，就连抽烟的人似乎也少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环境卫生有相当明显的改善。城市交通秩序也有极明显的改善，起码坐出租不会再让你急性心肌梗死。候机室也不再是公车站，大众似乎终于认识到其实并无抢先登机的必要。相反，有的人还极不自觉，办了登记手续后迟迟不登机，吃准了飞机绝不敢起飞，盖他们的行李已经托运，如果他们不来，机组人员就会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于是让其他乘客等个望眼欲穿，险化作望夫石。

可惜这种良性变化在上海几乎感觉不到，尤以地铁为然。每次下车都是一场战斗，盖那儿不兴“先下后上”，您再怎么喊都白搭。有几次我几乎下不了车，情急之下如跳水般迎着滚滚而来的人流扑了过去，冲得下面的人趔趔趄趄，七歪八倒，然而我非但不愧疚，竟然还有一种复仇式的喜悦。

上海从来领导中国时装潮流，因而大概是盛装淑女最多的城市，然而地铁上见到的那些摩登女郎个个是粗坯，甭管穿着化妆如何时髦，长得如何楚楚动人，都毫无文明修养与社会公德心。

地铁旅行有两种方式：买票或是购买充值卡。充值卡是电磁卡，可以隔着非金属物识别，于是许多人都把那卡放在背包或挎包里，把包凑上去，栅门就打开了。一次一位通体漂亮的闺秀（参见鲁迅译《死魂灵》）包里的卡大概没放对位置，包凑上去后芝麻仍未开门。她便傲然屹立在那门口，在包里乱刨。一女当关，万夫莫开，堵住了后面的人流凡十几分钟。到后来她大概觉得难以阻断历史潮流，于是便往旁边让了一步，却正好堵住了塞车票的那个口子。我前面的几个人都使卡，倒是不受阻拦地进去了。但我使的是车票，只好站在她侧前方，以一种很尴尬的姿势，向后伸出手去，用车票摸索那口子，摸了半天也没能摸着。这时那女的总算找到了卡，急着进站，却被我挡住了。她见我无法把票塞进口子，什么话都没说，干脆拿着我的手，把票塞了进去。我自变成人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奇事，又好气又好笑，忍了又忍才算没转过脸去，骂一声：You rude bitch!

总之，在上海坐地铁是一种令人身心交瘁的痛苦经历，下来后非常疲惫，因为基本都是站着，又非常之挤。有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座，才坐了一站，就上来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我赶快起来给人家让了座，却见周围坐的全是青年男女，对此视而不见，只有我这八旬老翁是赣大。当然，这似乎是普遍风尚。只有广州是例外，在地铁里居然有位青年给我让座。而且，一次我在自行梯上几乎摔倒，还有若干旅客伸出手来救援，令我心里暖呼呼的。

入乡随俗，后来我自己也变得非常粗暴。国人的规矩，是无视自行梯前的告示，齐刷刷地并肩站在自行梯上，让想快上快下的人无路可走。在上海时，一次我忽然见到，自行梯的左边居然是空的，只站了一个人，而那人的右边明明空着，他却要故意站在左边，让人无法快进。我于是走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待他转过身来时，我根本不看他，也不开口说话，只是用大拇指指了指右边，他立刻移到了右边，大概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吧。这种粗鲁勾当，也只能在国内才做得出来。

我知道上海人要说，那些事都是外地人干的，其实未必，还是上海本地人居多。是不是本地人，一开口我便能听出来，起码那两位摩的司机是本地人。实际上，外地民工反倒比本地人好多了。我有次提着箱子爬楼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自行梯），还有位外地民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当然，我不知道那位在广州地铁车上给我让座的青年以及那几位伸手救援我的人是否正宗广东人。但总的来看，老广似乎要比上海人文明些。

当然，社会风气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自动好转。Whopper-Junior 网友说的道德建立过程，给我的启发很大。对道德问题，我曾写过《“犬儒”篇》，重申了“道德来源的功利说”，记得最后一篇是《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大意是，道德是洗脑的结果，不可能靠个人自发建立。一个人之所以善良，除了遗传因素外，主要还是靠后天教育。而在中国重建社会道德的难题，恰在于中国彻底缺乏完成这个任务的道义权威。如所周知，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真面目早被绝大多数子民看穿，在道义上早就彻底破产，而中国的传统历来是由政府充当道德权威，因此龙应台才会到北京去宣讲由国府强制注入的“礼义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重建社会道德？

但 Whopper-Junior 的发言却让我想到，社会道德也有可能由新型的生活方式自然研磨出来。例如西方的道德来自于教会，与政府并无相干，根本不是后者的职能，然而如所周知，今日宗教在欧美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没多少年轻人还去教堂乖乖接受洗脑。然而却也未曾见到人家道德全面崩溃的壮丽景象。这原因，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大众普遍意识到“诚信才是最高明的博弈手段”，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罗素曾在《怀疑论》中说，美国的清教徒特别讲究诚信，而这教义却构成了做生意的竞争优势，让他们发了大财。他没说的是，这其实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非教徒哪怕只是为了竞争，也会效法这种美德，使得整个企业界都讲究起诚信来。

的确，今日中国的正经商家都已开始讲究商业信誉，尤其是服务产业。例如我在前文说的即时送水上门，据我哥说那是那家公司在广告中作出的承诺，人家真的说到做到了。当然，以诈骗为主业的企业不是没有，但一般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想做长久生意的商家也不至于太下作（当然三鹿是例外）。

仅以丽江旅游为例：诈骗者都是那种没在街上开商号，而是在私下拉客的野鸡服务人员。开在街上的旅行社都要跟客户签订旅游合同，而且确实做到了那上面的承诺。例如去长江虎跳峡，人家保证管中饭，还有八菜一汤，那承诺还真的做到了，当然提供的只是低档饭菜，那汤不过是洗锅水而已，但毕竟在书面承诺之内（但我这贱民的感觉是比人家请我吃过的各种宴席好吃多了，情不自禁一连灌他八大碗，栾平他醉成泥一滩，那主要是因为其浓厚的“伙食团味”让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温馨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劳累饥饿的缘故）。导游当然也与各种商店分成，因此免不得要领着游客去购物，但人家事先就说明，那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非白衣魔鬼那种强制性卖药，让你毫无拒绝可能。

上文提到过的摩的又何尝不如此？那俩师傅之所以半道涨价，首先是那职业的本质就是短线的，没有什么回头客，乘客的感受如何并不会影响他的长久生意。其次是我没有投诉可能。后面这点也很重要。例如出租车也是短线生意，但上海当局管得比较紧，司机不敢乱来，上哪儿都要向你解释他为何选择那条路，藉此表白他并没有故意绕大圈。天

津的司机也如此。其实俩城市早就面目全非了，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哪条路最近，只是为防上当，不免哼哼哈哈，装出门槛精、一门清的莫测高深状。不仅如此，我过去从来不要发票，上海的一位出租司机还好心劝我打票，说那上面有车号还有投诉电话。如果我在车上忘记了什么贵重物品，或是自感受骗，都可以打那电话。我从此便听取了他的建议，只是从未用过，盖的士司机一般还比较诚实。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一位企业家朋友给出的。他说，他从来不逃税，良心十分清白，盖逃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欺诈行为，至少必须把会计拉进来，而这就有可能被人讹诈，所失还会超过偷税所得，由此造成的烦恼与精神压力就更不用说了，云云。

当然，要诚信变成最佳博弈手段，前提是必须建立一个赏诚罚伪、赏善罚恶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做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才能逼得公民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不得不遵守社会公德。这过程开头是被动的，少不了虚假意味，但传上几代后蔚然成风，则公民也就能像鬼子那样，诚信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是国内网民说的"逆向淘汰"的问题。政府在无关他们钱包的行业里可能搞赏诚罚伪，对出租车就是如此，但在关系到特权集团的利益时，则绝对只会利用把持的权力，赏伪罚诚，赏恶罚善。换言之，权力的介入，阻碍了工商社会自动转化为有道德约束、有法律管制的文明社会，这才是中国文明化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

以上所说，当然不包括国外传入的人道主义影响。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若干城市都有无偿献血点，而那儿还颇有些自愿献血的男女青年。我想，这大概只能用西方流入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解释。

当然这作用也很有限。例如同样是青年，我认识的一位青年是所谓"啃老族"，大学毕业（现在的城市青年似乎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生，当然那是"民"［＝sub］大学生，比不得我们当年）后一直闲居在家，死吃他父母。待到他爹病倒后，实在没钱养他了，他才不得已去找了个工作。他爹害的是没法治的病，无非是能拖多久的问题，天天呻吟床褥，而他根本不在乎，根本不到医院去看护照料，日日和女朋友玩出玩进，研究的是如何考驾照，以致照料他爹的任务完全落到了他妈和他姑身上。无论是用 Whopper-Junior 网友不以为然的旧道德，还是用西方文明社会的新道德来考量，这种人都只能算丧尽天良的畜类。

我不知道这种畜类在青年人中的比例有多高，我知道的就是，靠"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考虑，绝对无法培养出传统道德提倡的孝心来。因此，实行了公平竞争的工商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最终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诚信社会来，但恐怕不能引入爱心，后者似乎必须靠从西方引入人道主义情怀，然而这只可能是个洗脑活动，于是我们又再度回到了"谁来做新时代有公信力的道德权威"的难题。

六、民智

这也是个不能靠走马观花就随便下结论的复杂问题，只能说说靠不住的模糊印象。

窃以为，别说与毛时代相比，即使与 80 年代相比，国人的平均文明觉悟也极大地提高了。海外许多人喜欢吹 80 年代那个所谓的“启蒙时代”，认为那是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私心期期以为不然。那阵子中国知识界当然比现在“有良心”多了，可惜那不过是毛时代的惯性运动，绝大多数识字分子，哪怕是顶儿尖儿也罢，对西方文明（亦即现代文明）一无所知，连最起码的文明观念都没有。哪怕是所谓“高知”也毫无世界视野，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井蛙。

80 年代所谓知识界最醒目的特点，是它仍然实行一元化，永远只有一个主旋律，杂音和噪音是绝对听不见的。识字分子们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只会为某种强势的宣传席卷，傻乎乎地投身进去，为一些他们丝毫不知道内涵的口号躁狂。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 30 多年的愚民教育使然，但也跟社会结构有关。那阵子的社会毫无有产阶级，本身就是一元化的简单社会，并未分化为如今这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复杂社会。套用现在时兴的话语“屁股决定脑袋”，那阵子的识字分子根本就没有屁股，当然更没脑袋，能做的就是如同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一般，跟着哗众取宠的“时装大师”文盲方励之、温元凯辈赶时髦。

89 年的那场“风波”，完全是承五四运动的余绪，乃是近现代史上最后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以愤青为主导的“良心祸国运动”。从思想史的发育脉络来看，如同海外民运是中共革命余绪一般，那场愚民运动（倒不能说成是暴民运动），也只能看成是中共革命余绪。

我在前面谈中国经济奇迹时，曾假定 89 年学运成功，中国在苏联之先民主化了，这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绝不会发生。要知道那伙完全彻底的文明盲上台后能建成什么国家，看看他们到了西方文明世界之后的表现足矣。靠一伙毛共“土高炉”里炼出来的废钢铁，就能搭起西式文明国家的框架，这奇特幻想实在超出了老芦贫乏的想象力。

别的不说，对比一下海内外中文网就够了。哪怕在中共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国内某些网站（例如《凯迪》）的主持者、斑竹与写手们仍然表现了远远胜过海外中文网同行们的文明觉悟，从而在和平竞争里彻底压倒了海外同行，使得国外中文网成了完全可以割除的发炎的阑尾（这当然是比喻，阑尾其实并不如大众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个无用的冗赘）。这原因就是人家真的实行“客观、公正、理性、宽容”（这是《凯迪》的口号，写在每个论坛的顶上），对各家各派实行“一视同仁，费厄泼赖”。如果说时评还因我党铁腕压制而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么起码史论已经基本做到了。

谓予不信，请到《凯迪》的《史海钩沉》看看去，那儿既有毛粉，又有蒋粉；既有爱国志士，又有汉奸；既有专制派，又有民主派；既有国粹派，又有西化派，什么五花八门的派别都有。各派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帖子数量（当然不是质量）基本均等。各派日日在那儿争论，各派都有拥趸，而且基本上都还是说理，骂“五毛”的下作坯子当然有，但多是跟帖者，并不是写手们。后者并不像海外所谓“民运大腕”们那样，动辄指责论敌是特务，谴责其政治立场，深追其罪恶用心，甚至堕落成高寒、胡安宁那种政治流氓，凭空造谣，污人清白，或指控我是使馆间谍头子的座上客（高寒），或指控我向 CIA 告密（胡安宁，真是文盲，白让他在美国呆了 20 多年，连 CIA 不管反间都不知道），害得他连夜逃回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去，靠童贯爷爷赏赐他的银两，在杭州那人间天堂购了豪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李锐告密案”的辩论。某个毛左出来捏造周惠的谈话，说后者说，如果不是李锐，则庐山会议也不会开成那个样子。什么“军事俱乐部”就是李锐的杜撰。他“夜闯美庐”去告御状，引起了毛的震怒，彭黄张周才因此被整，云云。作者冒充当年的党史工作者，号称在 80 年代参与了所谓的“抢救党史”的工程，据说亲自采访过周惠。文中披露的信息看上去非常可信，连我这辨伪高手都将信将疑。但马上就有位真正的党史专家出来，援引毛本人的讲话、黄克诚本人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确凿的史料，抽丝剥茧，逐条驳斥，使得真伪立见。这种高水平、高风度的辩论（当然是驳斥的一方，捏造的一方文风则极度恶劣），我还从未在海外网上见过。

更滑稽的是，某位毛左楞要说，毛从未主张过“亩产万斤粮”，不但如此，当部下报喜时，他还泼冷水，说自己是农民出身，亩产万斤不可能。在视察某农村时，当地公社干部让小孩站在密植的稻谷上，毛还说，爬的高，跌得重。因此，浮夸风其实与毛无关。他还煞有介事地引了毛语录，装得十分“学术”。话音未落，立即就有人贴出毛的大批语录，有许多直接就是当年报纸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有关文章的照片，其中最逗的是 1958 年《人民被日报》报导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曾亲切指示当地农民：粮食太多吃不完，可以一天吃七顿嘛！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文明辩论。当年参加《海纳百川》网站的筹建，就是想搞这么一个网站，其宗旨就是“中立独立，一视同仁，费厄泼赖”。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我足足折腾了五六年，折腾得五痨七伤，最后几乎所有的前芦粉同仁都与我破脸，干脆把网站财产抢劫一空，放火烧船，趁我辈沉入海底时，趁机开张了一家据说是“海外中文网上最自由的网站”（郑义的评价），由一群自摸家在那儿看“闭路电视”，构成一个无穷的正反馈环——不断吸纳自己发出的信息，放大后再输出去，感染他人，麻醉自己，集体吸毒，集体致幻，以为国内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时时准备揭竿而起，“支共”分分钟垮台，而他们立即就能打道回府，去当革命功臣。

“民主”痞子们离开后，我又苦苦撑持了三四年，最后实在受不了爱国贼们无穷尽的侮辱，只好来改办小区。想起来真是无限辛酸：哪怕是逃到自由世界，仍然要被以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的毛共余孽团团围住，而对于尹进那种“应该剥夺爱国贼的发言权”的赤裸裸的毛共主张，大多数网民竟然安之若素，还需要我这高手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出来与之打相打！

我苦苦奋斗十年未能达到的目标，国内的志士仁人们却实现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真正的民主精英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敢问 80 年代的所谓“启蒙运动”，到底为中国引入了什么最基本、最起码的文明概念？当年那些出名的大腕，又有哪个如后来的秦晖、王力雄、沈志华、萧功秦、朱学勤等人一样，有着清醒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与世界眼光？大腕们不必说，敢问当初写《河殇》呼唤“蔚蓝色”的那几位知青，又有谁具有本区金唢呐网友那宽广的世界视角与对国情民俗的深湛了解？

这当然是时代使然。80 年代，大家都是密封罐头初开后冒出来的土老帽，谁也没见过西洋景。作为过渡，那个时代是必需的，也不能说当年的大腕们一点好作用都没起。他们虽然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子，更没有文明常识，但起码知道中国在各方面都太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把这信息有效地传达给了公众，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使命与存在价值，不能抹杀。但这基本还是个感情现象，唤起的不过是百姓对西方的普遍艳羡心理。真正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的，我觉得还是开放导致的信息流通（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以及引入复杂的工商社会生活方式的结果。当今的中国，再不是毛时代那种太平天国式的原始简单的军队式社会结构了。改革开放使得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变，经济规模极大倍增，社会的复杂程度剧增，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物质生活的多元化，当然要引出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良性变化。

社会的普遍富裕，似乎也消解了过去识字分子们的躁狂激越的通病。当年“大腕”们擅长的煽情散文笔法（这就是他们写“政论”的唯一路子）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感召力与说服力。如今的读者要冷静得多，不失持重与理性，不仅对极端的主张天然反感，对刻意煽情以及专在“良心”上做文章也倒了胃口。人家看的是你的思路与论证有无道理，是否有软硬伤。这和 80 年代的懵懂知青们绝对是两个作派。

我自己就曾接到若干青年网友来信，或指出我在文中流露了对蒋介石的感情倾向，美化了他；或批评我对土改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真实，台湾土改并不像我说的那么单纯，也有强迫命令，而民国时代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是高利贷，但我并未触及这问题。而且，我介绍的我太太的长工姥爷的海皮日子不过是个例，不能据此作出一般归纳；或指出我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一文中过于相信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他本人在鄂豫皖苏区留下的文件证明他当初也很左，等等。这些批评都非常有见地，说明如今的读者再不是我们当年那种傻逼猪头三，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不让我心花怒放。

我这次回去见到的青年才俊之士更是令我刮目相看，乃至肃然起敬。这些同志有的是思考型，有的是行动型，根本就不是 80 年代能产出的。这区分其实很粗略，例如一位所谓“行动型”的青年志士思虑之细密，令我叹为观止。未经人家同意，我不能在此详细披露自己的印象，可以说的就是，这些青年同志有理性，有理想，有信念，有为之献身的决心与实践，却又不是近现代史上盛产不竭的革命青年，而是非常现实，从本国国情出发，踏踏实实、点点滴滴地去为国为民做点具体的事。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跳出过去百年的“专制——革命——更专制”的鬼打墙的希望。

这些同志当然是凤毛麟角。80 后网友锺会小赤佬已经说了，他的同侪都是昏昏如醉的混世魔王。就算真是那样吧，小赤佬们至少比老帮菜们有点现代文明觉悟，起码萌生了初级的“权利”观念，在人际关系里知道彼此的权界在哪里，知道尊重他人的隐私与决策自由，不至于闹出魏碑式“诤友”笑话来：主动告诉我他的个人信息，据此逼问我的个人信息，更几年如一日自报奋勇，不请自来地指导我的写作方向，反复向我指出文学创作才是我真正的特长，力谏我立即停止写作政论与杂文，改去玩文学，甚至几次打电话来，试图制止我写作《马悲鸣精品评点》系列，浑不知其中的《盲人摸象说民主》与《培养奴才与蠢材的中国教育》是我到那时为止写出来的最好的网文。

这当然不是说前途无限光明。在识字分子中，愚昧者恐怕还是大多数，疗愚正未有穷期。但我的模糊感受是，如今的知识分子与 80 年代相比，有如中国人的体型与鬼子的体型相比。如所周知，国人长得比较均一，虽有高矮肥瘦之分，但差别不是太大，亦即所谓“统计方差”不是太大，而鬼子肥的巨肥（尤其是老美多巨妇，雄伟至极），瘦者奇瘦，高者极高，矮子很矮。80 年代的识字分子都是傻逼，思想均一，个个是潜在的革命愤青，而如今的知识份子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了，不但政治理念发生了多元化，思维能力与价值观念等等也出现了多元化。

比起来，我觉得越老的越没出息。尤其是 50 年代的大学生，除了个别异数，都不可能真正醒悟了。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对美国的莫名其妙的仇恨。

不少人告诉我，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乃是为了赖掉本国的巨额外债，让我这经济学的绝对外行目瞪口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点最起码的常识：人民币升值只能改变兑换率，并不能使中国拥有的美国债券贬值，除非政府去把拥有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而这绝无可能发生。真正使得债券贬值的，是美国本国内的通胀。

对方想了半天，似乎想明白了这点，但又改口说，美国滥发钞票，就是为了赖债。我说，通胀的确能让中国拥有的债券缩水，但我认为，美国政府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振兴本国经济，倒未必是出于赖债的考虑。中国之所以受害，乃是因为美元兼具本国货币与世界货币的双重功能。一个民选政府首先考虑的，当然只会是本国利益，根据本国经济需要来决定货币投放量，而这未必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但美元这种国币成了“球币”，是人

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是历史造成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这样了，硬要说是现在才想出来的大阴谋，恐怕说不过去。

对方并不气馁，说，美国真可恨，为了赖债，逼咱们买他们的债券。我说，哪有这种事？有哪个国家能逼其他国家买自己的债券？中国对美贸易多年顺差，用廉价商品换来大量美元。这些美元若是存在银行里，利率未必会高过通胀率，因此会缩水。而美国债券的利率要高得多，信誉又一直很好，因此中国政府把这些钱拿来买债券，当成对美投资。当初中国政府若是把挣来的美元买成设备或是其他物资，哪怕是消费品也罢，用于自家经济建设和改善国民生活，岂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趁美元硬的时候买成实物，中国还会吃亏吗？您说到底该怪谁吧？

对方仍不气馁，质问道：那美国为何要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不是明摆着坑害人么？我答道，有位经济学大腕郎咸平郎小白，天天在网上大声疾呼，揭露美帝狼子野心，主要论据就是中国人沦为被美国廉价雇佣的打工仔，惨遭美帝剥削。这说的也是实话，基本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太低，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品非常廉价，甚至比在中国买还便宜。您说说，这是不是崇洋媚外，用国人的血汗去孝敬洋大人？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被外国资本家剥削的程度也减轻了，诸位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

但对方仍不服气，我最后不耐烦了，说，您说说，中美的经济交往究竟是谁吃亏吧？30年前，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完全是天壤之别，是不是？甭说别的，那阵子美国早就普及了汽车，而中国城市居民中，别说私人只有“小凤凰”、“小永久”，就说官家吧，一个省会城市里，全城能有的小轿车总数恐怕也不满百，还多是什么“伏尔加”、“拉达”、“华沙”等岁月悠久的珍贵文物，连如今的北韩都不如。自打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了贸易关系后，中国从一个与非洲差不多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据说再过二三十年就能赶上美国了。如今许多去美国旅游的国人，都觉得美国已经夕阳西下，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旧房子，哪比得上中国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整个国家就是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蹶不振，大批企业倒闭，而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两家做的这生意，到底是坑害了谁？既然美帝野心不死，天天阴谋策划把中国推进深渊，最后怎么反成了他们自己掉进深渊里去呢？

这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每次都毫无结果，对方虽然理屈词穷，但并不服气，仍然认定美帝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狼。我发现，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国人的阴暗猜疑习惯，刻意把仇美情怀注入了许多识字分子的内心深处。这些人并不光是头脑简单的愤青，同样囊括了相当多的成熟的专业人士。前者尚是可教子女，后者大概没治了。这种相当普遍的仇美情怀，会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内政造成什么恶果，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损害，目前还很难预言，但无疑会对中美汇率争端增加不确定的变数。

总而言之，窃以为，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识字分子应该说是比 80 年代成熟多了，复杂（sophisticated）多了，精明多了，清醒多了，当然同时也堕落多了。这对中国的未来

有什么影响，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认为这仍然可以算是一种大体健康的变化。至少，大众不会再傻傻地以为，中共砸烂的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真是他们说的人间地狱。在《凯迪?史海钩沉》的《那山那水那人家——民国时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图片长帖之后，就有位读者跟帖道：“旧社会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让我看了非常欣慰。

七、危机

毋庸讳言，对此问题，本文要说的，只是小马过河，盲人摸象（而且还是骑在奔驰的马上飞快地摸了一下）的朦胧感受，连一家之言都不能算，还待更了解实情的国内网友砸砖（对了，这次我回去听到的最让我开心的恭维话，乃是某位高手跟我说：老芦，你虽然久居国外，但写的时评和政论没有隔膜感）。

本文题为“镀金帝国”，乃是抄袭马克?吐温与华纳合着的《镀金时代》。老马写那书时，有人歌颂他所处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于是他便用了这个标题，说他那个时代其实是镀金的，表面看着堂皇，内里未必光鲜。这其实也是我这次回乡的感觉，金碧辉煌的门面下，掩盖着破铜烂铁。改革开放 30 年积压下来的社会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

最主要的感觉，便是政治危机。如今的中国倒颇像马克思笔下描绘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根本矛盾是上层建筑再也无法适应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了。政府这件严重缩水的紧身衣，越来越难以管束日益长大的躯体，迟早要被撑破。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国际共运乃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复古运动。斯大林发明的新型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元化”，亦即铲除一切民间社会，消灭所有的阶级、阶层与集团，把整个社会改造为非常单纯原始的奴隶社会。它只由两个阶级组成：监工与奴隶，说好听点便是干部与群众。所谓群众非常之单一，无论职业如何，其与生产资料的联系方式绝对同一，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便是只有站在小便槽前，他们才能掌握“生产资料”（他忘记补充，这只限于男人民）。换言之，这种国家的人民只有职业之分，并无阶级之别，只有国家（state），毫无社会（society）。

这种国家构建方式的优越性，在于统治者非常容易控制百姓。空前发达的强大而且庞大的监控网不用说，光是管住粮道，便能卓有成效地制每个公民于死命。人为造成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的同一与均一（identical and homogeneous），使得公民如同军营里的大兵一样，非常容易操控管理。

这就是 totalitarian regime 的工作前提。所谓 totalitarian regime，通译为“极权政体”，好听点的译法是“全能政体”。老帮菜都该知道这意思，那便是党是全能的，包办人民的一切，代他们作出一切决定，据说是负责照管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如同奴隶主包养了

奴隶一样，负责照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奴隶只需老老实实干活就是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乐园"里的新型社会分工。

如今可完全不是当年那样了。上文已经介绍过，如今的中国社会再不是毛时代那种太平天国式的原始社会。光是经济的规模，就大到了政府无法包办的地步，起码再也无法靠军队式指令去如意操控。不仅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得政治光谱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雏形已经出现。

别的不说，私有制的出现并构成了 GDP 的大头，为国民提供了 80%的就业机会，就使得万能的党失去了对每个公民食道的绝对控制。不仅如此，这些企业一旦倒闭或是纷纷逃往国外，立刻就要让国民经济受到无法承受的打击，而这是斯大林当初设计这背时政经体制时绝对没有想到过的。

互联网的问世更是使得控制者们穷于应对，斯大林发明的密封罐头已经成了永不再现的往日的好光景。光是为构建并维持防火墙，国家就不知投入多少金钱，维持庞大的正式与雇佣的"维稳"暴力（国安、公安、武警、保安、协防，等等）的成本就更不用说了。

不难想见，随着经济规模与社会复杂度的发展，随着国内外信息流通量的剧增，这"维稳"成本将与日俱进，不知伊于胡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滑稽的局面有点类似当年苏美军备竞赛。更准确地说，是堤坝与洪水比赛上涨的速度。当然，中国政府现在是史无前例地有钱，一时还没有显示出类似苏联被美国拖垮的迹象，但万一经济危机爆发，政府再没钱支付庞大的"维稳"预算时，又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党的权威的逐代弱化。

老金对我提出的"权威逐代递减律"作了两条重要修正：第一，这逐代递减只限于三代，三代以下即无明显递减。第二，权威递减也发生在军界，因此，军界野心家趁党中央四分五裂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并不大。

个人觉得，这两条都有待商榷。中国与前苏联在这方面的演变有两大重要区别：第一，直到崩解前，苏联一直保持着易于操控的一元化社会，其基本的奴隶社会架构从未如中国一样，被多元的国民经济打破。第二，苏联一直实行终身制，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是"以身殉职"，而中国则由邓小平规定必须实行周期性"和平接班"，由此提供了各派竞争党魁大位的可能。很明显，比起终身制来，这种安排要极大地增加政局的变数——野心家们不必靠风险极高的秘密宫廷政变，便可以相对安全地出来竞争大位，因为如今再也没有强人出来指定接班人了。

这第二个问题，我早在 5 年前的旧作《谁来指定第五代核心？——以"点菜律"预测中国未来》（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544494）中指出了。从那以后观察

到的迹象，在在提示了这问题的严重性。最明显的现象是，不但我党控制不住军队，以致多名军头出来妄言国事，代政治局出来宣布对美核战略，而政府发言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连党本身也显示了四分五裂的样子。如今颇有点传统社会末世群雄并起、互不相下的典型景观：这边厢，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发行毛语录，大作亲民秀，延揽民心，那边厢，温家宝大声疾呼政改，而且说得非常激越。自老芦有记忆以来，除了 89 年那短暂的时期，还真没看过这种四分五裂的西洋景。

您说这算是咋回事？党到底是要向左还是向右？到底是谁当家？阿温究竟有无背景？若是无背景，他公开承认了"普世价值观"，何以不会受到整肃？若是有背景，何以《光明日报》要发表社论不点名批判，而且他在国外的讲话要被国内报刊大肆删节？

这种怪现状似乎只能有一个解释：发生在社会上的多元化，已经渗透到了党内，党内也开始多元化了。虽然没有 80 年代那种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的阵营划分，却也没了老邓那种一言九鼎的铁血强人，因此只能是左中右互不相下，自行其是。换言之，如今在党内，再也没有"我说了算"那种党魁了，而那可绝对是斯大林主义的推行前提。

证之以大员们的外交表态，这迹象似乎更加明显。前段若干军头鼓噪，要在南海与美国"亮剑"，却又有位资深外交人员出来表示不能这么干，还是要维持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最近流氓国家北韩蓄意搞搞震，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全世界独裁者，团结起来"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甚至高调纪念所谓"抗美援朝"，然而美国泄密的外交档案却披露，若干中国外交官员曾私下表示赞同由南韩统一北韩（据 FT 中文网）。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活到了今天，已经是尾大不掉，控制不了它自己了。这结果，便是中央可以被地方甚至军方绑架，发生类似当年日本的"下克上"。即使不是制造既成事实，利用民意强迫中央接受，起码也能在自己的弊政引出恶果时，利用民意夺得话语霸权，为自己文过饰非。

民族问题便是一个例子。听一位民族问题专家说，西藏上次爆发的骚乱，其实并非民族矛盾使然，主要还是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所致。但地方政府为了保自己，便蓄意说成是民族问题，把自己打扮成"反分裂主义"的坚强战士，并利用我党 "民族主义"教育模塑的虚骄民情打"民意"牌，把那自发骚乱刻意"做成"达赖集团的大阴谋。这么做只能激化民族矛盾，逼反藏族，增加离心倾向，可谓坑害国家坑害党。

我觉得此话非常有理，其实无论是西藏也好，新疆的七五事件也好，就本质而言，和内地发生的骚乱也无什么不同，都是党官贪污腐败激出来的。我党为了维持政权，刻意树立国外假想敌，煽动仇外思潮，煽动大汉族主义，这一套当然会被地方官员接过去，利用它来骗取财政拨款，粉饰"政绩"，掩盖真正的弊政，正如文革中各地"老当"接过毛发明的代理战争去煽动派斗一般。西藏与新疆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有达赖集团可赖（这或许就是"达赖"的意思？），而新疆没有个现成的"境外敌对势力"罢了。

更危险的是，我党的“爱国主义”宣传以及它模塑出来的浮嚣民意，为军头们提供了最便捷、最廉价、最简单的自我炒作手段。每逢中外争端发生之日，便是这些人出来充当廉价的“民族英雄”之时，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冯玉祥、李宗仁、蔡廷锴辈“抗日倒蒋”。这可是中国武人的优良传统，虽未必真会像我在《当中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公元2093 年大事记》中预言的那样，发动军事政变，但一定会使得军方鹰派势力恶性膨胀。尤其若是美国或日本让了步，就更会提升这些人的威信，加强他们在军内党内的地位。上次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方获胜，必然会大长军方威风，大灭对外不失持重的小胡的志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扮演强硬的民族英雄既然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那只有白痴才不会去争做鹰派。而靠“爱国主义”维持政权的党中央，根本就没有制约军方的道义制高点与话语霸权。这就是十年来我反复劝告过我党不要玩“民族主义”这把火，而他们至今尚未放弃这愚昧国策的原因。

党管不住自己的另一恶果，是地方政府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不要脸的江湖恶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是“红黑合一”、“警匪合一”，什么道理都不讲，什么面子都不要，直接就动用黑社会搞强行拆迁，现在搞的“集村併屯”就闹得天怒人怨，导致各地武力抗争事件频发。而据说中央有明文规定，集村併屯必须经过村民同意，可各地政府根本就不买帐。

按理说，中央不至于昏聩到去干这种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蠢事，但无奈它是再也约束不了部下了。李刚事件与王立军的“双起”豪言，既反映了地方黑恶势力（=政府）的嚣张，也反映了中央的柔弱。胡核心的最大的能耐，无非也就是搞掉直接对他构成威胁的陈良宇之类大诸侯，根本也就约束不了更下面的人。党管不了自己，听任地方官吏胡作非为，那当然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当然，这不是说国家立刻就要崩溃，海外的“中国自摸政府”马上就能回去接管。我一再说过，权威弱化只对内成立，也就是事涉内部分赃时，则我党必然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但一旦涉及到镇压人民、捍卫权贵集团的整体利益、维持其统治时，则我党必然高度统一，精诚团结，雷厉风行。而我党仍然对人民具有全面的压倒性优势，杨佳的牛耳尖刀是绝无可能推翻我党的，更何况没法组织起来的人民，永远只能是一团散沙。这人类常识，也只有白痴才看不见。

即使如此，我党也并不安全。斯大林当初作的是一种原始机械的静态设计，它完全靠自上而下施加的机械压力来维持系统的平衡，却彻底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维稳软件，就连个程序化的权力传代机制都没有。这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我党对人民的压制的弱化速度，比不上中央对下面的压力的弱化速度。内部权力链条的断裂，迟早要引发内讧，无论军内是否有铁血强人，这趋势都是必然的，其实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我党或许还能维持个二三十年，但并不能阻止这一大趋势越演越烈。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如此之深，

一旦我党真的垮台了，则全民必然陷入血海。只有鼠目寸光、彻底丧失理智的右愤才会看不出这点来。

补救之道，我早在 6 年前便说过了。在《“鸟笼民主”会有前途吗？》（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507853），我告诉大家：

“平民政治在西方也是上世纪才全面铺开的。此前英国实行的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鸟笼民主’，也就是以财产、教育程度、甚至性别来限制公民资格。国民必须有一定的财产和文化程度，才能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到了上世纪初，这套作法才逐渐被打破，最后进化为全民民主，如今国民无论财产、教育、性别、种族如何，到了１６岁就自动成为公民。

在我看来，以限制公民资格来搞有限民主，确实是一种搞'穷民主’的聪明办法，使国家在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前就能实行民主治国，既能享受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又能避免南斯拉夫式灾难，国家政权被暴民劫持，全国陷于战乱，甚至演出种族灭绝的惨剧来。”

据此，我多次建议我党效法改革前的南非，把党员看成白人，把公民权赐给他们，而把非党员视为黑人，暂不赐予公民权，先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藉此解决中央权威弱化的问题，使得中央有足够权威去整肃全党的腐败。可惜这是做不到的，
=我已经在那篇文章预言过了：

“其实一党执政也可以实行民主。日本自民党包揽内阁几十年，人家不也是民主国家么？但那有个本质区别，人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各派轮流坐桩，在某种程度上也实行了西方式的相反相成。所以，要实行真正的党内民主，前提是必须容忍党内有合法的反对派。两派各自在党内拉帮结派，费厄泼赖，公平角逐政治局那党内内阁。敢问我党可有那胆识这么干？

再乐观的挺胡志士恐怕也不敢说这话吧？但如果做不到这点，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没有对抗，就绝对不会有清除腐败的压力。胡温想靠实行'没有对抗的党内民主’来保持党的廉洁，'拒腐蚀，永不沾’，完全是缘木求鱼。”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低估了胡温的平庸度，猜测他们能作出的最大政改措施，便是“把党代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那样的常设机构。地方各级党魁，以后都得由这常设的地方党代会名义上选出，再报经中央批准，才能正式就职。在执政期间，还得在名义上受党代会的监督和制约，并须及时向之述职”。过往六年的实践表明，他们连做这政治美容术的胆识都没有，如今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有那胆识，在党内引入西式民主？

当然我可能也太悲观了。兴许，我党现在这四分五裂的鸟样，有可能逼得他们最终正视现实，把党从“毫无规矩的低档土匪山寨”，改造为“靠推举决定接班人的唐代藩镇”，抛弃党内周期性进行的拳头大赛，解决斯大林原设计留下来的永恒的接班人危机。这虽然不能解决我党日益溃烂的难题，更不能化解社会矛盾，但或许能保证几十年的安定不被党内大规模内讧打破。兴许，这就是国人能盼到的“太平盛世”吧？

这次回去的又一个感觉是，奸相朱镕基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危机已得到缓解。前文提到，十年前，老朱把中小型国企统统送给贪污犯，把我侃广大工人阶级直接抛向街头，从此生老病死，各安天命，高效制造出失业大军。那阵子真有点民怨沸腾的感觉，若是当时有个北极熊输入饷械，有个毛委员在井冈山落草，那我相信我那些穷哥儿们一定会“梭镖亮堂堂，工农齐武装”。要说“崩溃”，那阵子还真有点像。当然我也反复说过了，一个政权要垮台，决定性因素不是民心，而是统治者有无镇压人民的足够意愿与能力。如果民意能决定政权存亡，则共党早就垮了十七八次了。

眨眼间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失业大军已被腾飞的经济吸纳。我在各地遇到的的哥，大部份是那阵子裁下来的人。十年前我回去，的哥们个个是口若悬河的国务家，从您坐上去就开骂，骂党骂政府骂贪官骂奸相朱镕基，一直骂到您下车还兴犹未尽。我的旧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基本就是北京一位的哥的演讲记录。但如今的哥们似乎都从政坛退隐了，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不再是当年的愤愤不平家了。

我虽然没能找到当年的穷哥儿们，不过也不难猜出他们的下落：到年龄的退休吃社保，没到年龄的，好点的办个小企业，倒房产，炒股票，做点小生意，再不然去当的哥，差点的去给私人企业打工。鸡有鸡路鸭有鸭路，好像没谁活不下去，必须扯旗造反。总的感觉是，急剧增大的经济规模与出路的多元化，终于吸纳了被政府从直肠里无情排泄出来的工人兄弟。整个社会的极大富裕，使得这些人逃脱了绝对贫困化的厄运。

但这些人的相对贫困化却令人怵目惊心。我有幸参观了一个富人别墅区，那富丽堂皇而且极富艺术品位的庭园令我大吃一惊，比起欧洲见到的皇家园林似乎也未遑多让（我还真说不上那是阳刚还是阴柔，虽则是西式庭园）。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国企干部（好像还不是老总，似乎是什么供销科长）的爹娘，（科长大人并不住那儿，那是他孝顺父母的礼物）。那房子真是美轮美奂，用李鸿章参观忠王府的感受来说便是“真神仙洞窟也”，为我平生见所未见。当然，老芦是酸丁，在国外来往的多是腐儒，并无富豪，或许国外的千万富翁能到那水平也未可知。

比起其他大鳄来，这位目不识丁的科长大人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据官方《人民网》报导，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收受巨额贿赂，第一天就从她办公室抽屉里搜出某银行向她贿赂的 110 万支票，此外还查出多张购物卡和银行卡。她坐拥七套房产，仅位于“山水华门”高档住宅区的一套房产就值 1000 万元。知情人士称，她过一个节日收取的各种购

物卡价值即可达数十万元，其受贿金额可能超过 5000 万元，本人生活糜烂，以谈对象为由养小白脸。

就连这也算不上什么惊奇新闻。据《人民网》报导，山西省洪洞县普通交警王建雄同志竟然有 3 亿身家，当地盛传王建雄同志在北京有 6 套住房，海南 15 套住房，山西临汾市和洪洞县均有住房，三个孩子都在美国上学，一年学费在 100 多万。而且，该报导还说："在洪洞县，这个煤矿资源大县，身家千万上亿的煤老板甚至地方公务员并不鲜见，老百姓对此也早已司空见惯。"煤老板不足奇，地方公务员居然也身家千万上亿，而百姓对此也早已司空见惯！

那么，这位普通交警是怎么发家的？完全是江湖黑道那一套。该报导披露，王某当初当公路巡警队长，经常扣留运焦炭的车，也不罚款，只是把人家的焦炭卸了许多。一个司机被盘剥得烦了，干脆答应给王建雄每年"孝敬"50 车焦炭。除此之外，王建雄还经营自己的车队，没有牌照，不用交费，由此捞到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在铁价最好的时期经营铁厂，在煤炭价格最高的时候经营煤矿，成了巨富。若不是他因为区区 300 元赌债被杀，则这位"亿万民警"的发家史也不会曝光。

这是什么烂污社会？历史上最烂的朝代也不如现今万分之一吧？公务员是不是都可以说："今夜，咱们全是和珅"？如此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社会，若能长治久安，当真是超出了我贫弱的理解力。

问题还在于，传统社会还能有明君反腐，因为皇帝与官僚们不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如今咱们的明君在哪里？党国领袖本身就是官僚集团的优秀代理人。中国又不是他家的家产，无法传诸后代，政权只要不在他手上垮掉就行了，他又何必为党国命运操心？这就是据说陈云要说："反腐亡党，不反亡国。"不管陈云是否讲过这话，这的确是我党无法钻出来的困局，为我党特有，并不见于传统王朝。

好在中国人民的承受能力是无穷的，只要有口饭吃就能忍受下去，君不见山西洪洞县的老百姓对亿万民警、亿万公务员早已司空见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更可怕的是民族矛盾。十年来，我一直在反复警告我党，靠煽动仇外思潮获取人民对政权的认同后患无穷，完全是饮鸩止渴，因为中国并不是日本那种单一民族国家，煽动"民族主义"只会促成多民族国家解体，在我党垮掉后，让中国沦为前南斯拉夫式种族灭绝的修罗场。

这次回去，危机感更加深了。据朋友说，新疆问题已经从"民族隔阂"过了"种族仇恨"的转折点，再不可收拾了，完全是靠当局的强大镇压力，才能维持勉强的"和谐"。此话并非危言耸听。一位大学生告诉我，对维族就是应该实行三光政策，中国需要的是王震那样的铁腕人物。解决新疆问题的唯一手段，就是把维族统统杀光。这种话从一个十八九

岁的大孩子嘴里说出来，让我从头抖到脚。更让我不寒而栗的是，旁听的人除了我之外，竟然无一成人反感！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中共是为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统治集团，但它能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灾难，很可能还是它自身的垮台。我党这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制造了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储蓄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为在它垮台后把中国炸到九天之外，埋下了无量的高效炸药。我能给那些住在民族地区的汉人的劝告就是：趁现在户口制度名存实亡，赶快逃出那些地区，跑回内地来。天下没有不垮的帝国，不要倚冰山如倚泰山。

另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危机。30 年来，我党"打左灯向右转"，打着马列毛的旗帜偷偷摸摸走资。这对土匪从良来说，或许在最初是必要的，但在从良多年之后还要"四个坚持"，那就是向野心家们跪送死穴，向挑战者拱手相让道义制高点与话语霸权了。

这尴尬连小青年都能一眼看穿。有位青年在《猫眼看人》上发的感慨非常有趣。记得他说，马列主义讲究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现在中国有什么阶级？就两个阶级：官僚阶级与群众阶级，也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学习马列主义毛思想，是不是要让人民起来推翻官僚？一边讲"和谐"、"稳定"，一边高度肯定历史上一切杀官造反的土匪暴乱，这算是什么事儿？

这智力笑话也不用去说它了，关键是这种"高举旌表卖淫"的做法引出来的无穷后患。近年毛左的猖獗，凸显了这一点。我反复忠告过蠢党：真正威胁他们的身家性命的阶级敌人，不是在民众中毫无影响的民主派，而是跃跃欲试打土豪分田地的毛左。草根毛左当然多是说大话使小钱的懦夫，真正的威胁在于党内。任何一个有点足够眼光的政客，都不难看出此中蕴藏着无比雄厚的政治资源。在一个"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的病态社会中（常态社会的人绝不会有这种感慨），毛泽东永远对草根民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亟待野心家们去开发利用。而只要"毛泽东思想"还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左起来推翻党中央那修正主义集团就完全是行宪。如同美国国父们强调人民有权以武力推翻暴君一般，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生前反复谆谆教导过："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个人觉得，薄熙来同志就是这种机灵人，瞅准了"公平与正义"的巨大政治商机，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当然，他倒不是真想搞原教旨毛泽东思想，主要还是以此作秀，制造人望，延揽民心。但这类同志出现，毕竟为政局增添了不少变数。若是日后再出一个比他还更忠于毛思想的太子党新秀，请问中央该如何对付？

解决这个人为危机的办法，我也早就作过建议了：我党最好还是与毛"平滑切割"，用"默杀"的方式将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排泄出去。不要再蠢到如小胡一样，去强调现政权与毛政权的传承关系，反而凸显两者之间的突兀断裂。党国领袖务必牢牢记住：再把毛

供奉在神龛上，非但不能 justify 现政权的存在，而且只能从根本上动摇现政权的合法性。地球人都知道，诸位是毛泽东的叛徒逆孙，而非他的接班人。既然背叛了，那就一反到底算了，省得左右得咎。反正今天大众服从我党领导，并不是因为傻到误认为党中央还是当年那个毛中央，而是因为第一，承认我党枪杆子的威力，第二，经济还在腾飞，个人境遇还有改善希望。

当然这切割必须平滑。最平滑的方式，便是尊重社会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要再压制自由主义者们，起码要让他们拥有与毛左同等的发言权利。让他们以铁的事实粉碎毛泽东神话，藉此有效消解毛左的民意基础，冲蚀他们的道义资源。与此同时强调邓小平以来的历届领导拨乱反正，把中国从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灾难中拔出来的历史功勋。待到火候差不多了，便悄悄地把宪法总纲那几条拿掉。一个多元社会，岂能由几个死人的一家之言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何况那些死人的每句话都是颠覆自家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这才是巩固权位的正道。

尽管有着上述严重的社会危机，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行将崩溃。如今的中国人与 80 年代末、90 年代相比，最显著的变化便是从政治动物变成了经济动物，极大地去政治化了。我遇到的亲友无一人知道刘晓波是何许人，《零八宪章》又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可都是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知识份子，10 年前都是愤愤不平家，现在都成了务实派，对政治漠不关心，无一人愿听我讲那些事儿，盖那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因此，我觉得老金的介绍非常真实，至少大多数所谓"高知"是维持现状派。在这点上，现代中国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实现了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的联姻。虽然现在的高知阶层远远没有传统社会士绅的能量，但这种联姻仍然为政权提供了相当的稳定性。

当然，这种稳定性的存在前提是经济不断增长，使得大众始终有"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盼头。于是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增长便成了我党的生命线、幸福线。

必须承认，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党的应对还是相当出色的，可圈可点，与其愚不可及的外交形成鲜明对照。据 FT 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该网刊相当中正平和，撰稿人都颇有水平。说来有趣，我看到这份网刊，完全是拜某个网氓［我怀疑是狼信驴费-满伯-和尚，但没有证据］之赐。他为了骚扰我，不仅盗用我的名义写信去骂智力难民营的主管，而且用我的公开邮箱去订了无数网刊，使得我那邮箱每天接到上百份网刊。好在大多数都可以退订。而 FT 中文网是我唯一保留下来的网刊，在此向诸位推荐，个人觉得确实值得一看），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斥重资刺激本国经济，将投资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增加对那些国家的出口，以及提升内需，等等。

这几项措施都取得了成效，国家不但实现了"保八"的目标，去年的增长率居然还是两位数（好像是 11.6，记不得了）。不仅如此，国内消费占 GDP 的份额还提高了，说明提升内需确实见效了，这在近几年来还是首次。于是在全世界一片狼藉之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一枝独秀，使得许多人开始豪情满怀地谈论"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复苏"。

不过据我这次回去的一点道听途说，国内经济并不是那么光鲜，虽不能说危机四伏，但似乎隐患也不少。

首先是"国进民退"的倒行逆施引起的恶果。上文说过，斯大林主义的操作前提，是强占国家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彻底剥夺了人民造反的可能，但同时使得经济毫无生机。为了向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因为政府再也扮演不下去那"万能的奴隶主"的角色，照看每个百姓的衣食住行了，便开始了有限的私有化，从斯大林式共产主义过渡为希特勒式国家资本主义，即朱镕基的"抓大放小"，对政府与百姓的角色重新作出定位，由国企（也就是政府）负责捏住国家经济命脉，由民企（也就是百姓）负责实现经济繁荣，实行"管控"与"生产"分工明确的两条腿走路，其实也就是当年大清"官督商办"的改进版。这结果就是上面提到的，在三十多年（其实主要是最近十多年）内，民企产值便构成了 GDP 的大头，提供了 80%的就业机会。

这却引起了胡锦涛那团干部积极分子的恐慌，他转正后便倒行逆施，实行"国进民退"。听朋友说，如今民营企业家很难做生意，盖某些国企为了独霸市场，自恃有国家雄厚财力的支持，不怕亏本，实行"让利倾销"的恶性竞争，挤得民企难以生存。因为盈利实在微薄，又有时时发生烂帐可能，资金流通困难，许多民企难乎为继，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火爆，于是企业家们便纷纷将资金从实业中提出，改去投资房地产。FT 中文网不但证实了这一私人信息，而且还补充说，许多民营企业家因为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都在考虑将资本转到国外去。刻下中国民间资本家大举进军国际资本市场，虽然体现了其雄厚财力，但也未尝不是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

如所周知，本人是绝对的经济学外行，真说不上如果"国进民退"越演越烈，把民企资本统统挤到国外去，中国会不会步西方国家后尘，被产业利润更高的国家吸去内力，造成本国产业空洞化。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提供了 80%的就业机会，若是它们要么转移到国外，要么被国企挤兑得破产，肯定要再度制造庞大的失业大军，而那对政府可绝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另一个问题也是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仍未实行文明社会的工商规则。据说，在西方做买卖，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中间商不管能否卖出去，货到都得付款，而中国可不是这样。商品生产出来后，由厂家先将它们"赊"给商家，卖出后再付款。这种做法，不但阻碍了厂家的资金流通，更造成了坏账发生的绝好机会。另一位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一位亲戚是个小企业家，据说刻下那企业已经快开不下去了，一方面是竞争激烈导致盈利极度微薄，另一方面则是卖出去的产品收不上钱来。

老芦是腐儒，从未涉足过商界，对此说法捉摸不定。一方面，我觉得那位朋友说的西方交易规则似乎确实是这么回事：君不见但凡经济衰退来临，商店纷纷关张前，照例都要减价出清存货？可见他们卖的货业已买断，真个成了自家财产，并不是赊来的，否则何

不退还给厂家？另一方面，卖书好像确实采用国内式“赊货”方式：发行商先赊给书商，待书商卖完后再给钱。若是卖不出去，则将赊来的书退还给出版社。反正老狼经营的《芦笛文选》在香港是这么卖的，总不能说深受大英熏陶的香港商人还不懂西方工商规矩吧？

这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那位朋友所说不确，东西方做生意都用“赊货”方式，风险完全由厂家而不由商家承担；要么书籍是一种特殊商品，不按西方通行的工商规矩办事。到底是哪种可能，还请国外的奸商网友指点。

另一个相当实在的威胁是通胀。听一位在国内银行工作的朋友说，其实国内现在的 CPI（我还是第一次从他那儿听到这个词，查了一下原来是 consumer price index）真实值已达 8%，远远高于官方承认的 3%（亦即通胀的临界线）。此话可能过于夸张。但国内通胀确实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据国内多家网站报导，深圳与香港的日用品物价业已倒挂，以致深圳主妇连油盐酱醋都到香港去采购。

在我这外行看来，引起通胀的因素较多，首先是制度性通胀，这是咱们的货币政策与外贸政策造成的。如所周知，中国多年对美贸易顺差，换回了大量美元。但由于国家管制外汇，出口商得到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换回来的美元由政府拿去购买债券，等于到美国投资。这笔财富的流失，当然只能靠政府开动印钞机来弥补。出去多少美元，就得在国内印刷多少人民币，于是便人为增加了货币投放量，当然要引起通货膨胀，人为压低汇率更恶化了这问题。

另一个因素则是所谓“进口型通胀”，而这问题简直就无解。在《文明真空》一文中，我曾质疑美国消费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那种资源小国。的确，如今中国的石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汽车拥有量剧增，汽油当然只能靠进口，这势必抬高国际油价，引发国内通胀。随着其他资源也消耗殆尽，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据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先生说，有人预言 2012 年中国就要赶上美国。真要到了那步，我看全球能源危机恐怕也得爆发了。

第三个因素则是政府似乎主要是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而那些工程似乎并非短平快，需要不断往里砸钱，这也只能促进印钞机的转速。

以上诸因素中，第一个因素似乎可以用人民币结算来消除。现在政府也在尝试这么做。第二个因素则非但无法消除，只怕会在未来越来越严重。第三个因素也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因此，窃以为在可预见将来，政府不可能有效抑制通胀。不仅如此，中国贫乏的资源，为经济规模封了顶，刻下的好光景可能难乎为继。

最可怕的还是房地产的大泡泡。国内的房价，简直高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这种偏离国民平均收入如此之远的房价，要维持不垮，简直就是无情挑战世间一切常理。但若是垮了下来，势必引起日美式连锁反应，使得经济一蹶不振，长期陷入低迷。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这伪经济学的绝对外行的管窥蠡测，还盼伪经济学的真假大腕们不吝金砖。我的靠不住的外行模糊直觉（鬼话所谓 gut feeling）是，中国经济的规模超出了底盘的承受力，国务家们的抱负高过了实际国力，发展到眼下这样子，大概已经到顶了。当然也未必会出现草庵居士嚷嚷了十多年的“崩溃”，但在未来十年中，经济成长将会逐渐减速，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八、和平演变有无希望？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多次与朋友重点讨论过。虽然他们都比老芦高明多了，但彼此分歧却非常之大，甚至是对立的。悲观者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以暴乱终局，甚至以为大乱将于五年内发生，有的则认为大乱不会爆发，但国家也就只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乐观者则认为二十年内中国即能完成和平转型，平滑过渡为民主社会，有的甚至认为这变化当在十年内发生。

就连对政局是在收紧还是放松，各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有谓当局在步步退让，控制越来越松，众人之所以觉得越来越紧者，乃是因为民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要求越来越高，衣服没变，身躯在不断长大，当然就觉得管束越来越严厉了；而有的则认为当局就是在日益加强控制力度，公民的自由度与时俱减。

对这些前景估计，各人都作了论证。乐观者的论据大致可归纳为两条：一曰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私有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大头，“社会主义复辟”是再无可能了。随着经济自由的到来，政治自由迟早要跟随其后。二曰极权国家机器业已锈烂，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能力，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迟早人民要重获自由。

悲观论中“冻结说”的论据则是，官僚资产阶级绝无可能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对他们来说，任何民主改革都是老金说的吴法宪他哥——“无法捞”，绝不会为他们容忍。而我党的枪杆子可不是吃素的，大乱并无可能，顶多也就是点无关大局的局部骚乱，因此只会是现状延续下去，在可见将来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

“大乱说”的论据则是：社会危机不断深化，我党尚如晚清一般迟迟不思悔改，而专制机器又已经腐朽了，两杆子只剩下一杆子，笔杆子基本失灵，只能代之以买静求安，而经济隐患重重，现在国际形势又很紧张，中国以暴发痞子的身份闪亮登场，引起文明社会的一致憎恶。若中美汇率冲突加剧引发贸易战，或是中美在南海黄海上发生武装冲突，西方对华实行经济制裁，或是经济危机爆发，买静求安的根本国策失灵，则很有可能引

爆社会矛盾，腐朽没落的党机器很可能稀里哗啦垮于旦夕之间，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陷入大乱。

或许因为这些朋友都是高手，所以不论估计如何，都没人天真到认为中国可以发生什么“民主暴力革命”，推翻万恶的旧世界，锻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在老芦这局外人看来，这些见解各自有理，其分歧是必然的，盖谁也无法获得全面信息，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当然只能是盲人摸象。哪怕是党国领袖也无法获得准确客观全面的信息，盖制度决定了领导只会听到他们喜欢听的信息。

据说 2000 年奸相朱镕基之所以开记者招待会帮阿扁拉票，就是上了下级的当，那些人汇报前写了两份台情分析，一份是国民党当选，一份是民进党胜出，到时再看领导的神色决定掏出哪一份来，结果会议气氛决定了只能交上预期国民党大胜的报告。奸相信以为真，便乐得出来表演一番，声称他每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便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呸呸，十年过去了，这无耻作秀还让我止不住恶心。阿扁当了八年总统，怎不见他泪流满面高唱国歌，率领大军打过去？敢情他预备的棺材都是纸裱的，地雷阵都是哑炮哇。人家庞德挑着棺材上阵，最后可真的睡进去了，老朱为何不自动钻入他为自己准备的第一百口棺材，以谢国人？左宗棠也没睡他挑到新疆去的棺材，但人家可是平定了叛乱，不必再睡进去了。奸相答应杀的 99 个贪官在哪里？堂堂国务总理发的神圣誓言，竟然是从消化道下端逸出的，难怪民间诚信全面流失），结果反而激起了台民的逆反心理，让本来希望渺茫的阿扁如意当选。这事使人无比惊诧的乃是，文盲党混到这份儿上，还不知道凡事都该弄几份预案，以便无论结局如何，都有全套针对措施拿出来。不至于如奸相那样，傻瞪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王安石式奸目，指望全世界人民突然害了健忘症，忘掉他唱国歌、趟地雷、扛棺材的豪情胜概。

或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在不同程度上，大家也可能有着类似党国领袖的烦恼。每个人与外界发生的信息交换都是有限的，而且经过了自己主观好恶的过滤，使得信息处理系统成了个封闭的正反馈系统，选择性地接收自己想听到的信息，排斥讨厌的信息，形成看法后输出去感染他人，加以放大，信息传递回来后强化了自己原有印象，再度发送出去，循环往复，不知伊于胡底。这就是“中国过渡自摸政府”的发生依据，也是草庵的忽悠依据（BTW，我不同意看客先生对草包居士的评价。毛主席预言超英赶美现已兑现，只是时间说早了不是？当然，居士还是比主席英明，主席预见三年超英，结果是三年大饥荒，几乎赶上了山顶洞人，而居士预见经济崩溃，发生的不过是经济奇迹而已，相对说来比主席准确得多）。

因此，若是谁天天看《大纪元》，不到一个礼拜就会觉得天昏地暗，中国马上就要大乱。即使是看真正实行了海纳百川的《凯迪》或是《天涯》，若专看右愤的帖子，顶多一个月也能起到这种效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乃是人的本性，个人很容易不自觉地构筑“近亲繁殖”的封闭系统。

因为知道这陷阱，因此我和朋友讨论时基本是做“厅长”，多听少说，力图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影响对方。过后再结合自己知道的零碎消息，加以分析，力图尽可能客观地描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图景来。我的感受是，大伙儿其实都不错，只是可能需要加起来求个集合。

先说那是松还是紧的问题吧。窃以为，国内朋友首当其冲，对舆论管制的即时感受很强烈，因此未必能从长远时段来看问题。其实若是将现在的传媒与 80 年代那据说是最宽松的时期相比，今日百姓的言论自由度绝非彼时望尘能及。

先看文学作品，那阵子的小说基本还是政治宣传品，唱的还是我党的主旋律。哪怕是当年引起巨大轰动的作品，也基本是马屁文学。而如今的小说与港台的也差不多了，作者根本就懒得再拍我党的马屁，讲的都是家常事儿，见不到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支书的魁伟身影。电影和电视剧也大致如此，除了那些伪造现代史、吹嘘内战的下作东西，基本上还是所谓“生活片”、“文化片”，讲究的是娱乐性与趣味性。诚如彭定康指出的：“不谈政治也是基本人权。”中国人今日总算获得了“免于被逼着歌颂政府”的起码自由了。

非虚构作品又何尝不如此？虽然话题受限，国内报刊对弊政的抨击可以相当尖锐，南都报系尤其如此。前些日子宁夏吴忠市公安局跨省追捕甘肃省图书馆员王鹏，指王在网上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中考试舞弊为诽谤。《南方周末》当即发文指出，所谓诽谤是个人侵权行为，法律上属于自诉案件，公权力不宜随便介入。用老话来说无非是，这种案件本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民事纠纷，根本不能当刑事案件跨省追捕。

在舆论的压力下，吴忠市委、市政府不得不释放了王鹏，处分了有关处理人，宁夏警方还给了王鹏 1000 元左右的赔偿。然而媒体仍然穷追不放，连《新华每日电讯》都质问道：“案发地明明在宁夏银川，远赴甘肃办案抓人的却是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而被举报人的母亲'正好’在吴忠市担任主要领导。根据媒体调查。这一行动是通过吴忠市公检法各部门事前联合开会协调讨论，并获得相关领导批示的。由此不难看出，王鹏错案绝不仅仅是'使用法律不当’的问题。”最后连新华社都发了电讯，题目赫然是《遏止滥用警力迫在眉睫》。

敢问 80 年代、90 年代何时有过这种舆论监督？那阵子若是有此类报导，都是迎合某种政治需要的，有着鲜明的权力斗争背景，诸如张志新案、遇罗克案平反等等，几曾有过传媒为普通公民维权的事儿？83 年的“严打”不知道打了多少冤死鬼，可曾有人出来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背景下，不难看出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两起”（起诉“歪曲事实真相”的报社和记者）恐吓的由来——万籁俱寂半世纪后，中国于今才开始有了点舆论，而初生的舆论

监督已经初步显示了对黑恶势力极为有限的约束，以致局长大人要出来搬走这块妨碍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绊脚石了。

那么，这五十年的舆论一律是怎么打破的？这就是上文说的：如今的社会已经庞大复杂到难以靠斯大林的机械设计来管控了。如果光有传统媒体倒能胜任愉快，因为那毕竟只是少数人在运作。但网络的横空出世，使得政府严格控制传媒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光是那规模都超出了政府的管制能力。例如《凯迪》在国内大约只算中等网站吧，但每个瞬间的访客人数大致都在 10 万，而每日平均上贴率在 2-3 万，许多帖子都有很多跟帖，以致可达上百页甚至上千页。我在那儿看帖子，有时竟然耗费了足足一天，还没能看完一个帖，而我的阅读速度并不算慢。不难想见网监们的工作量该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效法毛共钳住悠悠众口，简直就没有多少可行性。

总之，网络问世给中国的冲击远比其他国家的大，它开创了"传媒人民战争"的新时代，使得信息的传递不再由专业机构垄断，每个普通百姓都可以是新闻记者或评论员。当专职传媒机构失去公信力之后，这种真正的"人民传媒"便取而代之。

这就是为何中国百姓对网络的倚重远远超过了西方百姓——后者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等获得更有专业水平的可靠信息，而前者主要靠网络的"小道消息"来获取对真实形势的了解。例如本人获知国际新闻与本国新闻的渠道主要是电视，本地居民似乎也如此，但我获知中国新闻则主要通过网络，尽管我家也能收到 CCTV 与凤凰卫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对我来说远比前者缺乏公信力。

这倒应了伟大领袖的话："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他没有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倍增了小道消息对大道消息的强劲冲击。为了与网络竞争读者，在市场经济中盈利，非国家包养的大道消息便不得不降低控制力度，变得更真实、更可信也更有可读性。这就是南方报系何以异军突起，使得广州取代上海成了文化中心——它不是国家包养的，市场经济逼得主持者们不得不"媚俗"，向真实靠近，而广东领导又历来比上海的开明。

发生良性变化的又岂止是南方报系？就连《搜狐财经》也能赫然登出谢国忠的文章，光那标题都是 80 年代不敢梦见的，而据说那是《人民网》上转来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909/n274811252.shtml

请注意，光是网民的评论就有将近 2 万条，绝大部份都表示支持，其中有位网友惊呼："我的天啊，这样的帖子都能不被删掉，中国言论真的自由了吗？"

是的，我觉得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言论自由了。过去与网友讨论这问题，我惊讶地发现，即使是美国华人，也未必知道"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以为那就是私下骂共

党的自由，不知道言论自由最关键的一条是 press freedom，亦即人民在传媒上发表政见的自由。49 年以后来人民彻底丧失了这自由，如今却得到了部份的有限的恢复。

当然，政府仍在竭力管制之。但在我看来，they are fighting a losing war. 对传统媒体（也就是杰弗逊年代的 press 以及后来发明的电视、电台等等）的控制仍然颇严格，因为那毕竟还是由专业人士、专业机构运作，具有技术上的可控性，但对网络这种新型 press 则无法做到类似的严格控制。其实比起来，使用这种新型 press 的人数，未必少于看电视的人，据说中国现有 6 亿网民，而前面已经说过了，网络对百姓的影响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当然，国内网络的言论自由度仍然远没有国外的高，但受限也不是均一的，依话题而异。在我看来，史论虽然有时还需作点美容术，但阐发基本观点似已经基本不受限制了。时评的禁区就多得多：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与政治反对派形成有关的问题，等等。若是抨击时政，则涉及根本制度反而没事（例如《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直接就是对根本制度的否定）。反过来，抨击或揭发的对象越具体，管制也就越严厉。例如我昨天爬网时，Tom 弹出一个即时新闻窗，谓邯郸警察动用黑社会暴打医护人员，我当时也懒得看黑吃黑的烂事，觉得那实行了林副统帅的教导："坏人打坏人——活该。"刚才去找，见谷歌列出了若干有关新闻标题，但帖子都被删去了。

由此似可导出两个结论：

第一，人民在一定程度上重获 49 年前的言论自由，证明了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的结论：社会进步一般是通过统治者主动或被动的让步取得的。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再不可能是计划经济了，而传媒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同样也就难以实行"计划言论"。这两个社会进步都不是统治者的主动恩赐，而是他们在形格势禁之下作出的被动让步。

第二，我党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某种"烂污自治"，患了小舞蹈症，党的躯体运动多数并非神经中枢下指令的结果，而是肌肉的自主抽搐。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制度，委婉指出人民的钱被党骗走了，反而什么事都没有，因为那与具体的党干无相干，但得罪了恶警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毋庸赘言，这有限的言论自由虽然比以前是个伟大进步，但舆论对政府的约束力仍然很微弱。周老虎案就是个雄辩的例子。那明明是陕西省林业厅与当地政府联手炮制的骗局，目的是把镇坪县"做成"旅游热点。这种烂事在国内如今已成时尚，例如云南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等等。唯一的区别只在于纸虎骗局被网民戳穿了。然而策划骗局的主犯无一人受罚，周老虎那毫无作案能力的文盲农民却当了替罪羊。所以，舆论在沉寂了 50 多年后再度在中国出现，起到的主要还是个泄气阀的作用，目前尚只能说是慰情聊胜无。

接着写下去之先，被迫回答北京棋迷那两个愚不可及的问题。只此一遭，下不为例。老芦余生有限，精力很差，要做的事多极，即使是割肉饲鹰的我佛如来，也不能再为缺乏低级思维训练的差生浪费时间。区区苦衷，还盼差生们体谅，有什么问题请去攻读我在网上免费提供的《全集》，那就是专门为差生们介绍人类常识的，针对性很强。诸位能想到的愚蠢问题，我早就在里面解释过无数次了。有那功夫咄咄逼人地强迫我回答，还要斥之为“毛时代的道德纠结”、“政治上正确”等等，不如自己虚心一点，认识到塔里木盆地与珠穆朗玛的海拔差距，老老实实地去那里面寻找答案。

现在来看那两个问题，一曰：老芦，你到底是要四五十年来一次的暴力革命，还是要南美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别告诉我你两个都不要，没辙！只有这两个选择，你只能挑一个！

这种问题都好意思提出来，还“字字掷地有声”，底气不是一般地粗，只能说明咱们的中学教育是何等失败。

任何合格的初中生都能看出来（起码我当年如此），这就像说“是吃米饭还是吃饺子只能选一个”一般，完全是个逻辑笑话，因为那并不是排中律决定的“either or”，除米饭与饺子外，还有面条、汤圆、锅盔、烙饼、面包、饼干等各种选择。除非“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那就绝对符合这种两择一了，因为并无第三者。棋迷网友这种选择填空，倒颇像逼着人在“砍头”与“绞死”之间只能选一个，仿佛此类选择等同于“要死还是要活”。

更可笑的是，棋迷网友竟然把“暴力革命”与“南美式权贵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居然看不到两者之间再明显不过的因果关系。就算头被水碓打了，也不至于看不出南北美的根本区别吧？正因为南美式烂污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制造、积累而不能消解社会危机，它才是暴力革命的温床。而北美社会因为具有保证“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维稳软件，它才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那种周期性大血崩。这就是我所有政论的主题，讲而又讲，讲了几百万字，为什么有人就是看不懂涅？那又不是什么哲学上的高深问题不是？

我知道棋迷网友还是看不懂，只好再吹一次轱辘笛：

1）我反对暴力革命，因为它只能促成社会倒退，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巨量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2）我反对中式官僚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毛时代道德观念纠结”，更不是什么“政治上正确”，完全是个功利考虑。任何非白痴都看得出来，在这种烂污社会中，权贵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亦即隐藏或公开的暴力），剥夺普罗大众的基本权利，使得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天然不利地位（这就叫压迫），并利用权力介入市场经济，实行不等价交换，掠取最大份额的利润（这就叫剥削），因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与阶级矛盾。更严重的是，统治集团剥夺了人民通过和平抗争与协商来实现合理分肥的权利，从而使得分配不公的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因此，这种烂污社会毫无和平化解社会矛盾的维稳软件，只能靠暴力去压服不平者，将社会矛盾积累下来，形成越来越深重的社会危机，最终在镇压机器弱化时爆发出来，招致革命或是暴乱。

3）我反对激进民主革命，因为那必然导致全局失控，不是像南斯拉夫那样导致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如苏联一般，在造出金融寡头的同时使得普罗大众陷于赤贫，社会治安崩溃，沦为"匪帮国家"（据"维基解密"【其实 wikileaks 应该译为"维基泄密"】，这是美国驻俄大使对该国的评价）。以中国社会危机之深重，民族矛盾之尖锐，一旦除去中共的镇压机器，则高压锅里所有的内容物都要喷射到天花板上去，令前南斯拉夫与苏联相形失色。

4）因此，我一贯主张"香港民主化，大陆香港化"，先把中国改造为香港式"有自由无民主"的开明专制国家，再逐渐向民主社会过渡。至于什么是开明专制，我也反复作过解释了，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基本操作内容是：

A、国民享有除了形成政治反对派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具有足够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言论自由。换言之，除了没有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权利外，公民具有文明社会公民的所有基本权利。

B、严格实行法治，以法律而不是党组织统治国家。作为过渡，可以效法国民党的"训政"，在实行党内民主（西式民主，即容许党内反对派公开存在）后，以各级党代会取代"人大"为立法机构，撤销各级政府，以政治局取代国务院，以各级党代会的常委会取代地方政府部门。在县以下取消党领导，试行民主选举自治。

C、党组织逐渐从公检法、军队、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全面退出。实行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经济、文教科研等部门与政治全面脱钩。

D、党政军警特等威权机构从经济领域中全面退出，保证经济活动不受政治权力干扰，使得国企和私有企业处于同一竞争平面上，凭本事而不是权力公平竞争。

E、国家用财力扶持文教、科研、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

我也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这就是欧美先进国家走过的路，其实也是日本人走过的路。中国的特殊问题，只在于必须治疗从前苏联进口的党天下顽症罢了。我还反复指出，国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公，官僚贪污腐败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是民怨的焦点所在。

据"维基泄密"，这也是李克强同志的看法，2007 年他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时，在接见美国前驻华大使雷德时承认，中国的 GDP 是"人造的"，不可相信。他还说，辽宁民众

对教育、卫生和住房问题都有不满，但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官员贪污。按棋迷网友的道德裁判标准，敢情他小人家也有"毛时代的道德纠结"以及试图表演"政治上正确"？

以上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必要性论证，可行性我也在旧作中做过充分论证，还特地给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那就是先实行党内民主（西式民主），藉此解决中央权威日渐弱化的致命问题。只有确保中央有足够合法权威，才有可能从上到下地整顿吏治，反腐倡廉。这主张完全具有现实可行性，唯一的障碍只是中共领导的愚昧、短视与贪婪。换言之，推行这改革遇到的障碍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

说到底，中国之所以不能步欧美先进国家的后尘，只能像南美那样在烂泥里打滚，使得社会永远无法获得维稳软件，最主要的原因是全民（不光是统治者，人民也如此）的脑袋比较特殊。如北京棋迷网友为大家生动展示的那样，他们只懂零和博弈（也就是一方全面压倒另一方、either 你吃掉我 or 我吃掉你的思维定式），不知道"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是确保各方长远利益的最佳博弈方式。

勿过，即使是颟顸腐朽如党中央，也不至于堕落到了北京棋迷的水平。例如李克强同志就曾表示，他愿意"让官僚系统透明化并迅速惩治涉贪官员"（出处同上）。按北京棋迷网友的标准，这当然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试图制造暴力革命，理当立即推出午门斩首。

您说中国的青年识字分子怎么能蠢到这份上？即使悬赏百万美金，要我刻意说出这种水平的话来，也还真是超出了我的主观能力。

当然，不容否认，中国人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里特有的惊天动地的愚蠢，使得和平改革中国政体、避免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我反复指出，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中央决策机构的权威逐代弱化，而发动全面改革需要足够的权威与实力。邓小平本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惜 89 学运吓得中共停止了政治改革。在他之后，这么做是越来越困难了。但政改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消除，盖政治局若真有心谋求长治久安，完全可以通过实行党内民主来重建中央权威。之所以做不到这点，不过是因为那伙人都是一群鼠目寸光的庸人罢了。

棋迷网友的第二个问题更搞笑，他居然给出了自己对"改良"的独家定义："改良就是尊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记忆如此，懒得去校对了，请以原帖为准）。Again，这又是他向老帮菜们大气磅礴地掷下的挑战，逼大家就此表态。Again，即使是悬赏千万美金，我也没那本事想出如此弱智的话语来。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我疗愚的一个重点，就是告诉差生们思维一定要清晰，先把您使用的关键概念拎清爽，不要在浆糊里面打滚，还把别人也拉进去。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有人就是虚不受补，愚不受疗，越补越虚，越疗越愚。北京棋迷网友绝非仅有个

例，以前的“高手”们诸如樊弓和鲁肃都这样。比起那两位来，北京棋迷似乎也不能算惊天动地。

如果知道那粗浅的思维功夫，则不难看出他这“定义”的无数问题：

首先，那“尊重利益”不知何所指？若是“改革时注意确保既得利益集团不至于大量失去已有财产”，那还颇有道理，因为它有利于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抗。但若是“改革就是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则那就是搞笑了。不幸的是，这恰是北京棋迷的坚定主张（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他只是缺乏清晰表述能力而已）。

其次，那“改良”不知何所指？在我看来，所谓“改良”，也就是“改革”（reform）换个说法而已（这是国人的拿手好戏），指的是自上而下地改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或经济制度），目的是为了消除制度性弊病，使得社会运转更合理。这“合理”既是道义意义上的，也是功利意义上的。从道义上来说，原制度之所以不合理，是少数人不劳而获，把大部份好事都占了，这就是一般说的“不公平”，大众因而愤愤不平。从功利上来说，大部份人都觉得无利可图，因而失去了创业积极性，形成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可持续发展。这才会使得当道者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任何非白痴至此都该看出来，改革与革命的目的其实一样，关键只在于手段不同。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而革命乱党对政府能否消除那些制度弊病丧失了信心，所以要用暴力推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再动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因此，革命家与改革派的区别，只在于“到底是由旧政府还是由新政府来主导改革”这一点上，但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的目的则是同一的。革命乱党的弱智处，是看不到那其实是缘木求鱼，采用暴力手段去改革，即使推翻了旧政权，也只会造出一个权力更大、更不受民意约束的新贵集团来，而这些新贵集团抢起社会财富来效率更高。这简单道理已为中国过往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

因此，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制度不公引起了深重的社会危机逼出来的。所谓“制度不公”，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了大部份发财机会，不许平民染指，而这恰是北京棋迷网友的理想社会。既然如此，何来什么改革必要？如果要尊重既得利益把持发财机会的特权，在改革中确保这特权不被触犯，那还有什么鸟的改革可言？那改“良”的“良”字究竟表现在何处？

明白了这最简单最粗浅最下滥的常识，则立即可以看出，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利益的再分配，只是改革有可能改变利益的分配方式，使之变得更加公平些（所谓“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有财大家发，不要由少数人垄断起来），而这就是欧美先进国家走过的路。而革命则是弱智国家诸如法国、苏联与中国惯搞的把戏，它们都以消除社会不公为鹄的，最后却无一例外地制造出一个以暴力为后盾的新贵集团，使得社会分配越发不公。

回顾欧美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改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权力从经济领域里驱赶出去，制止既得利益集团剥夺平民发财权利（上面已经说过了，这就叫“压迫”），以及权力介入市场经济，造成不等价交换（这就叫剥削），使得生存竞争不再是以隐藏的或公开的暴力为后盾的恶性竞争，社会各阶层都处在同一竞争平台上，从而使得各方都觉得有利可图。这不但消除了原有的社会矛盾，而且能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因素”，使得经济获得勃勃生机。这其实就是咱们历史书中介绍过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中国最需要而一直未能做的事。

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率的企业，是参与各方都觉得有利可图的企业”的简单道理。企业如此，社会也如此，一个社会若是不能让各阶级阶层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则必然导致财富向权势集团无休止地流动，贫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迟早要以乱局告终。

因此，所谓改革，就是剥夺权贵对发财机会的垄断，把它开放给每个人，这当然要引起他们的反抗。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为何改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枢动用权力去强制推行。但若因噎废食，为此就不改革，那国家只会一天天烂下去，危机越积越深，终难免革命惨祸，最后玉石俱焚，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人民都没好处。因此，聪明的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就不能不发动改革，只是尽可能降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常见的做法就是赎买，亦即尽可能不触犯该集团已有的财富，但剥夺他们对发财机会的垄断。换言之，已经装到腰包里去的就算了，但以后不准再利用权力抢劫人民。台湾土改就是个成功的例子。

希望以上所说能凿开棋迷网友那无边的混沌，不过我估计希望不大。比较可行的建议还是，你不必再读芦文了，对你没什么好处，虽然那是专门为差生们写的通俗教材，浅显易懂之至，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它。无论如何，以后若再赐教，恕我无暇答复。